

# 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

## 經驗與理論的反思

主編—蕭阿勤 汪宏倫

台北·南港



中央研究院  
社會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2016

# 3

## 流亡與時間，敘事認同與知識建構： 重探龍冠海與「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研究

---

蕭阿勤

## 一、問題緣起與問題意識\*

1949 年底，在國共內戰中失利的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敗退來台。此後國民黨政府宣稱台灣為「自由中國」，不斷宣傳要反攻大陸，但終究未能實現。1954 年底，美國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抵擋中共攻台的威脅，保障台灣的安全。不過美國將條約限於防衛性質，要求國民黨政府在不與美國協商下，不能片面地以武力攻擊中國大陸，因此實際上限制其反攻大陸的企圖（戴天昭 1996[1971]: 414-422）。1958 年 10 月，身為國民黨總裁的蔣中正總統與美國總統艾森豪派遣來訪的國務卿杜勒斯 (John Dulles) 會談，並發表〈中美聯合公報〉。在公報中，國民黨政府雖仍宣稱「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為其神聖使命，但也確切聲明「……此一使命之基礎，建立在中國人民之人心，而達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徑，為實行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中華民國年鑑社 1959: 252）。這份公報發表後，對國民黨抱持批判態度的在台外省籍知識階層的菁英，以及避難海外而反共的大陸人士，大致都認定國民黨政府已明白承諾不再主動使用武力以反攻大陸，因而對國民黨政府感到失望與憾恨（例如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會 1958: 6；施治華 1958: 11；工商日報 1958）。

到 50 年代末，雖然國民黨政府仍然繼續宣傳隨時要反攻大陸，但在上述的政治情勢下，對眾多逃難來台的外省籍軍民，以及香港等海外的避難者而言，他們的歸鄉夢，即使不是完全破滅，其實現也顯得遙遙無期。這種情形，就像當時籍貫天津的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王洪鈞所形容的，自由中國人民充滿了「精神上的低氣壓」，尤其是外省人在台

---

\* 本文初稿「時間、敘事、與知識建構：從台灣的『中國現代化』社會科學研究（1960-1970 年代）談起」，曾發表於「敘事的社會、社會的敘事」研究工作坊（2011 年 4 月 22 日，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感謝評論人傅大為教授及與會諸君的批評指教，以及助理張晉文、葉春嬌的協助。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NSC93-2412-H-001-011、NSC94-2412-H-001-001、中央研究院 99 年度深耕計畫的部分研究成果。

灣已度過十載寒暑，「昔日的少年今日已近中年，中年已成白髮」。「十年蜷居生活足使人銷磨志氣」，使人「由期待到焦急，由焦急到失望，由失望到消極」（王洪鈞 1957: 24；1959: 11）。

戰後台灣的社會科學開始有比較顯著的發展，在 60 年代，當時發展中的社會科學深受「現代化」思潮的影響。現代化的相關概念與理論對於 60、70 年代，乃至於 80 年代上半葉的台灣社會科學具有典範性的影響。不過台灣的社會科學研究關於中國社會（包括台灣）的現代化研究，並非單純呈現源自於西方的現代化概念與理論。它們往往也呈現清楚的中國民族主義，成為當時政治與文化上「中國現代化」論述的重要部分。60 年代圍繞著「中國現代化」而建構社會科學知識的研究者，主要屬於（用上述王洪鈞的話來說）「昔日的少年今日已近中年，中年已成白髮」的兩代外省籍學者。

60 年代中，屬於來台第一代的外省籍社會科學家，大都出生於 19、20 世紀之交，來台大致都已開始他們的學術生涯，來台時大約在四十歲上下。例如在 1960 年參與創辦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並擔任首屆系主任的龍冠海，於 1906 年生於海南島，1935 年開始任教於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學社會學系，來台時已 43 歲。<sup>1</sup> 另外，在 50 年代台海兩岸對峙的格局日趨確立中，那些逃難來台時尚處少年階段的外省籍年輕一代逐漸成長，在 50、60 年代之交到達二十歲以上的成年初期。來台後他們如果順利接受教育，大致都繼續銜接或才開始小學以上的階段。例如後來成為心理學者的楊國樞，原籍山東，出生於 1932 年，來台之後才開始上高中（楊國樞 1985: 65-66）

在 60、70 年代圍繞著「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知識建構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兩代外省籍研究者，親身經歷動亂。他們離鄉背井、渡海避難的痛苦經驗，在其個人生命歷程留下深刻影響。這兩代的社會科學家，

---

1 關於龍冠海的生年，這裏根據的是 1984 年 6 月出版的《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第 16 期「龍教授冠海、郝教授繼隆逝世週年紀念特刊」第 i 頁與章英華 (1991: 41) 的說法。張承漢與林義男 (1982: 224) 以他的生年為 1907 年，應為錯誤。

也都幾無例外，背負中國 19 世紀末以來深重的「文化創傷」(cultural trauma)，亦即對於國族飽受外國強權欺凌、內憂外患交迭、國困民窮的痛苦，感受深刻，並且充滿記憶。他們也幾乎都展現鮮明的中國民族主義，企望中國藉由現代化，能迎頭趕上世界先進強權。這些現實關懷焦點，表現在他們對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研究中，呈現為兩種時間參考架構的交錯，亦即關於世界朝向現代化變遷的歷史，以及中國傳統社會朝向現代化變遷的歷史。這兩重時間參考架構，在這些社會科學研究中，具體呈現為互相參照的現代化大敘事 (narrative)。

時間的參考架構或歷史敘事，如何形塑兩代外省籍社會科學研究者的知識建構？流亡的兩代社會科學家，如何在上述的時間參考架構或歷史敘事中，尤其是在關於中國追求現代化的國族集體敘事中，為自己所奉獻的知識追求，以及做為知識分子的個人生命，尋得定位與意義？這些問題，既牽涉戰後台灣文化與學術變遷的考察，也牽涉到社會科學知識建構的反身性 (reflexive) 研究，因此值得探討。本文著眼於逃難與知識文化發展的關係，在經驗分析上以龍冠海的中國現代化研究為例，分析焦點在於流亡經驗、時間感、敘事認同與知識建構的關係。本文以下先回顧既有的相關研究文獻，接著探討逃難與知識文化（包括社會學）發展的關係，並討論流亡、時間、敘事等概念，以及敘事與知識建構的關係，以鋪陳本文的理論分析角度。其次，筆者討論龍冠海所代表、宣稱客觀中立而實證的社會科學研究與敘事、時間架構的關係，以及其中所涉及的認同政治。在結論部分則指出，人們在認知上所進行的「敘事的理解」(narrative understanding)，是「社會時間」(social time) 建構的重要活動，具有文化結構的作用，足以形塑人們的意識與行動，因此社會學家或社會科學家有必要重新認識敘事在社會生活分析上，以及在本身所從事的知識建構上的重要性。

## 二、研究文獻回顧

迄今為止，針對筆者的研究對象——以 60、70 年代兩代外省籍社會科學家為主而圍繞中國現代化議題的知識建構，有一些既有的研究文獻，但數量有限。這些文獻性質各異，大致可區分為四類，和本文的問題意識與研究重點的關係不一。

第一類既有的相關文獻，概略記載 60、70 年代台灣與一般社會科學發展有關，或特別圍繞中國現代化議題的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的各種人、事、物等事實或經過。這方面的文獻，提供了一些基本史實，屬於事實性資料的簡單描述紀錄，有助於筆者確認當時一般社會科學或圍繞中國現代化議題的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的大致輪廓。這一類的文獻，例如魏鏞 (1980)、徐蕙蘭 (1982)、思與言雜誌社 (2002)、朱賜麟 (2006) 等。

第二類屬於雜憶，亦即記述師友同學之間的來往、印象、感受等的文獻，為 60、70 年代兩代外省籍社會科學者建構中國現代化研究知識時的學術潮流、校園氛圍、人際互動等，留下可貴的見證。這方面的文獻，譬如楊懋春 (1989 [?])、蕭新煌 (1984[1983])、葉啓政 (1984[1983]a) 等人追憶與龍冠海的交往接觸，又例如黃曬莉 (2002)、瞿海源 (2002)、葉啓政 (2002) 等人回憶他們與楊國樞的關係。

第三類既有的研究文獻，屬於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政治學等學科對本身在戰後台灣發展的回顧。這些回顧，當然也涵蓋各種人、事、物等事實或經過，提供我們對於戰後台灣社會科學發展的歷史認識。但這些研究文獻不限於描述基本史實與經過，更經常討論不同研究取向的發展、變化、貢獻與限制。他們的討論，也通常不限於學科知識內部的發展，而能剖析國內政治、社會因素與國外學術潮流的影響。賴澤涵 (1987) 主編的《三十年來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回顧與展望》，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其中與本文較相關而相當有啟發性的，是楊國樞與蕭新煌的文章。楊國樞 (1987: 6-7) 的緒論文章，論及戰後台灣人文及社會科學

學者的世代差異。他指出戰後渡海來台的第一代學者的「避秦」心態與還鄉情結，使「他們雖然身在台灣，所研究的主要對象卻是大陸的社會文化現象。這種重大陸輕台灣的研究風氣，甚至影響了土生土長的第一代人文學者及社會科學者（為數頗少）」，例如陳紹馨在 1966 年仍不得不強調台灣做為「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的代用品功能。<sup>2</sup>楊國樞認為，像他所屬的第二代學者，已擺脫還鄉情結，以安家落戶的心情，專注於探討台灣社會文化問題，不再視台灣為研究中國大陸的代用實驗室（楊國樞 1987: 6-7）。<sup>3</sup>蕭新煌的文章分析戰後台灣社會學的發展，同樣觸及學者的世代差異。他指出來台的第一代外省籍社會學家如龍冠海等，並沒有完整繼承或恢復大陸時期的社會學傳統，尤其是其中的「社區研究」傳統。由於與台灣社會有所隔閡，「他們所認同的依然是大陸社會，台灣社會對他們而言，並沒有深厚的『鄉土感』」，他們於是走向「不必講究鄉土性的『社會調查』」研究。蕭新煌指出，一直到 60 年代後期，部分由於第一、二代社會學家逐漸體認到難以還鄉，台灣社區研究才開始出現（蕭新煌 1986: 272；1987: 342-343, 351-353）。第三類的其他研究文獻，例如高希均（1973）、陳其南（1985）、蕭新煌、李哲夫（1986）、呂亞力（1987）、黃應貴（1987）、葉啓政（1991[1988], 2005 [2003]）、張茂桂等（2005）、湯志傑（2008）、Chang（2005）等。

上述第一、二類的研究文獻，限於描述基本事實或記載個人回憶感想，姑且不論。即使是第三類的研究文獻，對於戰後台灣社會科學的發展經驗，也仍缺乏一定的理論分析角度或具有理論意涵的闡釋。至於第四類的既有研究文獻，則與筆者的問題意識與研究重點最為直接相關，並且大致都具有相當程度的理論意義的討論。例如葉啓政與傅大為兩人的研究，是這方面研究文獻中相當值得重視的部分。葉啓政（1984[1982],

2 這裏指的是當時台大社會學系本省籍的教授陳紹馨（1966）所寫的〈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台灣〉一文。

3 楊國樞所談論的外省籍第二代學者的這種變化，類似 Lewis Coser 所指出 1930 年代初希特勒上台後逃難到美國的歐洲知識分子從「難民」(refugee) 到新「移民」(immigrant) 的身分認同轉變。見下文的討論。

1984[1983]b) 從 80 年代初開始，一直關心「中國社會學」（指自中國大陸時期以來，特別是戰後台灣的社會學）的特質，批評其援用外來概念理論的依賴性格與實證性格。葉啓政一向關懷中國社會（包括台灣）的傳統與現代化關係，在剖析這個議題時，他經常討論 60 年代台灣社會科學界開始的現代化研究。他強調，現代化的理論論述藉著宣稱反映客觀實然的社會事實，確立其科學的正當性與價值中立的面貌，但實際上現代化理論論述可視為一種描繪社會的「歷史哲學」，也是優勢的現代西方文化擴散所造成的典範（葉啓政 2005: 146-161）。葉啓政對現代化理論的剖析，有其洞見，尤其是指出其做為西方所傳布的一種特殊的歷史觀，正涉及本文擬探討的時間架構、歷史敘事、知識建構的關係。雖然葉啓政對 60、70 年代台灣社會科學的現代化論者抱持批判的態度，但他長期關注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現代化變遷的文化問題，因此他本身的知識追求，在敘事認同與知識建構的關係上，實則與那些他所批判的對象，有不少共同的部分。

傅大為的一些研究，則從一種「去中心」的知識分析與社會實踐的角度，探討 50 年代之後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特殊過程與性質。他指出，「五〇年代後，台灣以大陸系統為主的人文社會科學界已經紮好他們的基石」；殷海光在 50、60 年代熱情提倡實證論述的科學權威與啓蒙理性，促成台灣實證論述的興起。傅大為強調，台灣逐漸進入以美國資本主義為中心的世界體系後，人文社會科學界接受美國的現代化論、行為科學等，到了 60、70 年代，現代化論已成為社會科學主流（傅大為 1988: 53-55；1990[1988]: 85；1992；1993[1990]；1993[1991]）。不過傅大為也指出，雖然 50 年代以後「大陸來台的當權人文社會科學者」的研究與中國大陸時期的學術傳統已有差異而產生斷層，但卻仍常宣稱承繼過去大陸的某種傳統（如「五四」傳統）；而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的學術傳統被忽略，也導致學者的回顧（包括上述賴澤涵主編的《三十年來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回顧與展望》中許多文章在內），都以「大陸→（四九年後）台灣」的主軸立論（傅大為 1990[1988]: 84）。傅大為的這

個論點，與本文研究焦點所在的流亡、時間架構、歷史敘事與知識建構的關係，密切相關。在這方面的第四類研究文獻，又例如楊宜音(2002)、黃光國(2002)等。

葉啓政與傅大為的論點，提供了觀照、綜覽戰後台灣社會科學發展的清晰視野，對後來的研究者相當有啟發，具備了繼續深化理論的潛力。不過整體來看，這些第四類的研究分析，雖然已有相當程度的理論意涵與理論化潛力，仍然缺乏明確統貫的理論角度，理論化的發展值得繼續推進。包括前述楊國樞、蕭新煌等人的既有研究，都值得繼續深化。著眼於流亡、時間、敘事認同與知識建構的關係，本文以龍冠海為例，分析台灣的「中國現代化」社會科學的知識性質與內涵，正是朝著這個努力的方向。

### 三、概念與理論：流亡、時間、敘事認同與知識建構

#### (一) 逃難、知識文化發展與社會學

自古以來，由於戰亂、政治異議、宗教迫害等原因，世界各地的歷史，可以說充滿種種個人的或大批人群的逃難案例與經驗。被迫離鄉背井的難民，對特定社會的變遷與世界整體歷史的發展，經常都有顯著的影響。對於人類知識文化的發展、傳播、變化等，跨越政權統治的地理疆界的難民，也往往產生重大作用。舉例來說，在中國古代，西元4世紀末到6世紀中葉，鮮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王朝統治北方，約當南朝宋、齊、梁三朝。當時逃難到北魏的南朝人士，包括從東晉末年開始因政權更替、政治鬥爭而亡命的宗室人物、大族士人，以及原先鎮守邊境而叛逃的將領及其幕僚屬吏等。他們將南朝典章制度、經學、佛學、文學、藝術等傳播至北魏，在北魏的漢化與吸收南朝文化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王永平 2005: 176-195）。

另外，在西方，從《聖經》時代開始到 20 世紀初，猶太人在各個時期的不同帝國統治下一旦面臨政治動盪、經受暴力威脅而被迫流離四散，都伴隨著希伯來文化與藝術的重要進展。有著三千年以上古老歷史而相當具有成就的希伯來文學，明顯受這些歷史上的動盪所激發，而其主題與基調，正在於流亡與哀悼 (Aberbach 1997: 128, 136-137)。另一個例子是 1453 年拜占庭帝國（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被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軍隊攻陷後，原來在拜占庭統治下操希臘語的許多著名的拜占庭學者逃到義大利，對於古希臘學問更加傳播到西歐、激發文藝復興時期對古希臘研究的興趣，以及人文主義與科學的發展，都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那些為數眾多、同樣來自拜占庭的希臘語地區而較不知名的普通抄寫員及印刷商，對於將古希臘的知識傳播到義大利，也貢獻甚大 (Harris 1995: 119-149)。

近一個世紀以來，逃難對於知識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的一個顯著例子，是 1933 年納粹希特勒上台後大批知識分子逃離歐洲（包括德國、奧地利、義大利、匈牙利等）所造成。單以德國大學的學者而言，在 1930 年代末，大約已有 1,700 位因為猶太背景或政治立場而失去職位，其中的六成左右、亦即一千多人離開德國。1938 年，德國併吞奧地利，又迫使四百位左右的大學學者離職。到了 1940 年，被迫離開德、奧兩國的大學教授，總計高達 1,100 到 1,500 位左右 (Krohn 1993[1987]: 11-16; Lamberti 2006: 159)。在 1933 到 1945 年納粹統治期間，所有逃離德國的學者，其中大約將近一半到了美國。這些前往美國的難民學者中，約有四分之一、亦即一百八十位左右為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所救助 (Krohn 1993[1987]: 11-16)。到了 1947 年，逃到美國的德、奧兩國猶太裔或非猶太裔學者，約有 77% 已獲得教職，給美國高等教育帶來重要變化 (Lamberti 2006: 158)。

對社會學傳統的發展而言，上述 1930 年代歐洲的動盪，更有關鍵的影響。例如納粹掌權後，德國社會學家 Theodor Geiger 於 1933 年被迫逃

到丹麥，任教於 University of Aarhus，成為丹麥第一位社會學教授，並在 1939 年出版了第一本丹麥文的社會學教科書。納粹德國入侵丹麥後，Geiger 於 1943 年再度避難於瑞典時，曾任教於 Stockholm University、Uppsala University 與 Lund University，戰後則隨即返回 University of Aarhus。Geiger 包括法律社會學等的研究涵蓋廣泛，是社會學中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他對戰後丹麥社會學的建立，影響重大，也是重要刊物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Sociology*、*Acta Sociologica* 的創刊者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於 1949 年在阿姆斯特丹成立，Geiger 也是創建者之一 (Agersnap 2000: 325-327, 329)。

事實上，按照本身也是德國難民、於 1941 年抵達美國的 Lewis Coser 的說法，納粹上台後，社會學受害或許要比其他學科更徹底。大約三分之二的德國社會學教授被迫去職，而大多數尚未有固定職位的年輕社會學家則離開德國。在納粹統治下，社會學在德國，以及在奧地利，大部分已被摧毀。相當高比例的社會學者，不管較資深或年輕的，都逃到美國 (Coser 1984: 85)。這些逃難的社會學家，明顯地改變了美國社會學。20 世紀上半葉的美國，宣稱中立無私的實證主義與改革傾向的實用主義相結合，成為社會普遍的思想與行動的新典範，也成為學院中社會科學的指導觀點。在這種看法下，社會研究被認為要用表格與數字的方式來測量社會過程及呈現研究結果。雖然一直到 1930 年代，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家都還擁護個案研究取向，但美國占支配地位的主流社會科學方法論則是統計量化的社會調查。洛克斐勒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 為資助者之一的「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 於 1923 年成立，可以說是上述趨勢的制度化表現。與這種普遍「反歷史」、「反理論」的氛圍並不契合的德、奧學者，給美國帶來了馬克斯、韋伯、涂爾幹、佛洛伊德等人的傳統，以及現象學的哲學與社會學、國家理論等。整體而言，包括社會學在內，他們對美國社會科學的貢獻，在於各種質化研究取徑、歷史取向、對價值傾向有所自覺的人

文主義觀，以及對社會科學做爲博雅教育 (liberal arts) 的堅持等 (Breiner 2004; Coser 1984: 85-86; Lyman 1994: 495, 500, 504; Shils 1980: 110; Steinmetz 2010)。他們其中多數人，例如 Hans Gerth、Kurt H. Wolff、Werner Stark、Karl Korsch 等人，擔任歐洲與美國之間社會學知識的橋樑，藉著翻譯或其他方式，傳播韋伯、齊美爾 (Georg Simmel)、曼海姆 (Karl Mannheim)、謝勒 (Max Scheler) 等人的歐洲社會學及相關理論。至於這些逃難者其中的較少數，則對美國社會學及相關理論更有原創性的貢獻，例如開拓現象學的社會學的舒茲 (Alfred Schutz)，法蘭克福學派的霍爾克海默 (Max Horkheimer)、阿多諾、馬庫色 (Herbert Marcuse) 等，以及成爲美國的經驗的社會學調查研究奠基者的 Paul Lazarsfeld 等 (Coser 1984: 85-125)。綜括來看，社會學理論發展重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歐洲轉移到美國 (Alexander 1987: 18-19)，其中 1930 年代歐洲的動亂以及德、奧社會學者逃難到美國，可以說是重要因素之一。

上述眾多的例子顯示，流離避難的現象對人類社會的知識文化轉變，包括對 20 世紀以來社會學的發展，都有深刻的作用。戰後美國社會學對台灣社會學的影響重大，而戰後台灣社會學的建立，則主要來自從中國大陸逃難來台的學者，因此不管研究避難經驗對整體社會學傳統轉化的影響，或是探討它與台灣社會學發展的關連，都相當值得進行，值得我們關注。

我們必須留意的是，基於各種因素，避難者與他們尋求庇護所在的國家或社會的關係，無法一概而論。前述蕭新煌、楊國樞的研究，已經扼要指出，逃難來台的第一代學者對於戰後台灣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的影響，主要來自他們的「避秦」心態、還鄉情結、對台灣社會有所隔閡而缺乏深厚的鄉土認同。他們兩人的研究，值得參照、比較上述世界其他地區的歷史經驗，繼續深化。他們兩人的研究，都指向避難經驗中的一種特殊的狀態或性質，亦即「流亡」(exile)。1990 年代末，當台灣的「外省人研究」逐漸興盛大約十年左右，趙彥寧即相當有洞見地指出，外省人「以學術語言觀之應被視爲『流亡者』」，應該從「流亡研究」

的角度來探討（趙彥寧 2001[1999]: 152）。<sup>4</sup>就本文的關懷而言，來台避難的第一代學者明顯處於流亡者的情境，而探討他們對台灣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的影響，核心問題就在於流亡情境與知識建構的關係。

## （二）流亡情境與生命斷裂

在分析上何謂「流亡」，事實上眾說紛紜。這個概念所指為何，並不容易界定。在中文脈絡中，流亡者可能與「難民」等用詞混用不分。在英語世界，*exile* 更與 *diaspora*、*exodus*、*migrant*、*transmigrant*、*refugee*、*asylum seeker*、*cosmopolitan* 等用語糾纏不清 (Allatson and McCormack 2008: 22)。許多研究者認為，人們的流亡出於各種原因、造成各種處境，因此我們不可能有任何完整的定義來涵蓋（例如 Allatson and McCormack 2008: 22-23；Shahidian 2000: 71；Stroinska and Cecchetto 2003: 15；Tabori 1972: 26, 37；Woodhull 1993: 8）。就被迫離鄉之後在異地的經驗而言，就像 Denise Rollemberg 研究 1960、1970 年代流亡的巴西人時所指出的，除了個人人格特質之外，年齡、社會地位、個人資源、政治立場、政黨或團體歸屬、對當地語言的掌握、是否有家人為伴、流亡的不同階段等，都是影響流亡者日常生活的因素，造成相當不同的處境，帶來數不清的個人的獨特流亡經驗 (Rollemberg 2007: 82-83)。<sup>5</sup>換句話說，流亡者並非同質，「有複數的流亡 (*exiles*)，但沒有單數的流亡」(Kettler 2006: 177)。在這些討論中，流亡的意義事實上幾乎等於一般所謂的「逃難」，而流

4 不過趙彥寧以「流亡研究」為 *diaspora studies* (趙彥寧 2001[1999]: 152；2001: 201)，與本文專注的 *exile* 有差距，見下文對流亡概念的討論。另外，趙彥寧「……所定義的『中國流亡者』主指 1945 年（台灣『光復』）後來自中國，因各種原因留居台灣且直至 1987 年解嚴前無法『返鄉』者」，亦即包括 1949 年國共內戰末期、國民黨政府軍民大舉來台之前，「並非基於『逃難』原因而遷台者」（趙彥寧 2001[1999]: 153-154；2001: 201），本文的主要研究對象則為 1949 年之後的逃難者。這些概念上與經驗研究對象上的差異，主要在於本文強調逃難經驗及其影響。

5 參見 Coser 對希特勒上台後逃難到美國的歐洲知識分子的不同特質、影響他們適應新生活的各種因素的討論 (Coser 1984: 3-15)。另外，趙彥寧的研究 (2001)，從 *diaspora* 的概念角度出發，特別著重女性的特殊生命經歷，探討了包括 1945 年之後不是因為逃難而來台的外省人在內的「中國流亡者」（參見本文註 4），指出性別、階級等因素都造成她（他）們不同的生命經驗。

亡者也與一般的難民沒有差別。

不過如果我們不是以比喻或隱喻的 (metaphorical) 方式來使用這個概念，例如說內在的、精神的、或心靈的流亡 (inner exile)，而是指實際的經驗，那麼就造成人們流亡的原因來說，流亡者的核心特徵，在於他們的離鄉背井並非自願，而是出於被迫 (Hsiao 2010: 4-5)。與其他自願性的移民不同，流亡者通常出自宗教或政治等原因被迫離開故里，他們常見的特質，就在於沒有放棄歸鄉返家的可能 (Pavel 1996: 306)，而這正是使他們成為難民中特殊的一類的關鍵所在。

Coser 討論 1933 到 1945 年間逃難到美國的歐洲知識分子時，根據親身經驗與近距離觀察指出，移民 (immigrants) 離開母國，多半出於自願，雖然他們後來也可能想回到母國，但基本上想永久定居於另一個地方。流亡者則不同，他們被迫離鄉，並且通常認為故鄉的政治等惡劣環境，只是一時的歷史脫軌或錯誤。因此他們渴望一旦故鄉的政治等情況改善，就可以回去，至少在離鄉初期是如此期待。Coser 強調，他所討論的歐洲知識分子身為難民 (refugee)，大多數一開始就決定永久定居美國，因此更像新移民。但他也指出，其中也有少數一些人一直將自己當做流亡者 (Coser 1984: 3, 11)。例如來自德國、猶太裔的知名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她與丈夫長期住在紐約一家並不舒適的旅館，認為身為難民置產購屋並不恰當。同樣來自德國，在社會研究新學院任教二十年左右的政治學家 Arnold Brecht 也類似，他在美國期間與妻子一直住在旅館 (Coser 1984: 11)。這些現象，就如同與鄂蘭有深刻友誼的美國作家 Mary McCarthy 曾經談到的：「關於流亡者的整個核心就是他們拒絕扎下新根。他們比較不像植物，而像鳥兒，停棲在任何他們所在的地方，隨時準備飛回家。即使他們有錢買個小房子、長租一間公寓，他們寧願臨時的住宿……。如果一位流亡者買了房子或簽了長期公寓租約，那就表示他不再是個真正的流亡者」(McCarthy 1994[1972]: 51)。

80 年代中期迄今的二十幾年，巴勒斯坦裔的美國學者薩依德 (Edward W. Said) 基於親身經驗的細膩闡釋，經常為人徵引，被視為是對流亡的痛

苦情境與心態的典型剖析。薩依德指出，由於流亡者與自己的根源、土地及過去割離，流亡是「最悲慘的命運之一」、「終極失落的處境」、「斷裂的存在狀態」（艾德華·薩依德 1997[1994]: 85；Said 2000[1984]: 173, 177）。他強調，流亡者事實上並未與自己的原鄉完全切斷關係，仍然有著心理的聯繫。「因此，流亡者存在於一種中間狀態，既非完全與新環境合一，也未完全與舊環境分離，而是處於若即若離的困境，一方面懷鄉而感傷，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艾德華·薩依德 1997[1994]: 87）。換句話說，流亡帶來的心靈痛苦，主要來自一方面必須調整自己以適應新家，另一方面懷抱返鄉的渴望，但卻身陷兩者之間，難以擺脫。上述 McCarthy 所指出的流亡者的核心性質，亦即拒絕扎下新根，正來自這種存在狀態。曾任義大利總理的 Francesco Saverio Nitti，因墨索里尼上台而於 1924 年流亡巴黎，當他被問及在巴黎做什麼事時，他說：「我在等待」。<sup>6</sup> 這句話正扼要點出一種懸而未決的「中間狀態」。伊朗裔的美國女性主義社會學家 Hammed Shahidian 同樣基於本身經驗的一段話，生動地刻畫了流亡者處於中間狀態的精神痛苦：

流亡意味著心靈撕裂，有些碎片失落，有些碎片陡增，回憶盤旋不已。有時候，在一個人記憶中活生生的遙遠的一小段街道就代表家鄉；在別的時候，沒有任何從家鄉來的具體東西可以讓人滿足。有時候，一個人在流寓之地住所的四面牆壁就成了家的樣子；但在別的時候，即使一個人有資格可以合法申請公民身份，也不能讓人滿足。有時候，一首短詩，一卷散文，一份家鄉來的母語舊報紙就成了家；但在別的時候，即使是流寓之地在你腳下的堅實土地，也不能讓你滿足。流亡意味著讓人痛苦地理解到：你所居住的地方是家也不是家，你確實住在、同時也不住在家所在的地方 (Shahidian 2000: 76)（粗體字為原文的強調）

6 原文出自 Henry Pachter，轉引自 Coser (1984: 11)。

流亡情境與心態的核心，在於活在中間的狀態，難以安穩自在。Magda Stroińska 與 Vittorina Cecchetto 針對這種狀態的時間面向，指出「流亡者在空間中移動，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但是他們也同時進入一種與時間的關係，而這種關係饒有興味並且獨特。他們渴望他們已經失去的東西（過去），害怕那還有待來臨的東西（未來），但他們同時也不能夠面對現在」，就像羅馬的雙面神 Janus 一樣，望向兩個相反的方向（Stroinska and Cecchetto 2003:13，粗體字為原文的強調）。

如同上述，逃難對於人類知識文化的發展傳播，一向有重大作用。流亡的經驗與心境，也可能成為激發知識文化創造的因素，甚至使知識分子可以反思既有世界、帶來更活潑自由的思想等（艾德華·薩依德 1997 [1994]: 96-102）。不過即使如此，對大多數流亡者而言，羈留異地造成了社經地位下降、失去社會支持網絡、文化適應困難等，令人痛苦。就像 Shahidian 直接了當所說的，「流亡一點也不是帶有異國風味的創造力的島嶼，它可以輕易就變成沼澤困境」（Shahidian 2000: 76）。

簡言之，在空間與時間的面向上，流亡者都處於生命的存在發生斷裂的危機中。本文接下來的討論將指出，人們在時間的流逝中統合自己對於過去、現在、未來的記憶、看法或期盼而進行的「敘事的理解」，給自我帶來整合的認同，給自己的行動與生命經驗帶來意義。雖然在地理空間上，流亡者不得歸鄉，羈留異地而無奈痛苦，但從下文以龍冠海的中國現代化研究為例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帶有強烈國族認同的敘事所建構的歷史連續，無疑有助於從時間的主觀感受上，抒解流亡者處於中間狀態的生命斷裂感，維持一貫的認同。他們在流亡痛苦中的自我與知識工作，也在這種敘事中找到定位與意義。

### （三）社會學的時間研究與反身性的社會學研究

涂爾幹被公認是古典社會學中，時間的社會學研究與理論的開拓者（Hassard 1990: 2; Bergmann 1992: 83; Sztompka 1993: 53; Flaherty 1999: 2; Adam 2004: 45-46; Bryson 2007: 23）。在 1912 年出版的《宗教生活的基本

形式》中，涂爾幹開宗明義地從「理解的範疇」(categories of the understanding) 與宗教的關係談起，指出時間是人類最基本的概念或理解的範疇之一 (Durkheim 1915[1912]: 23)。如同 Piotr Sztompka 所歸納的，涂爾幹的研究取向被後來的社會學家所繼承的三個特點，在於其社會學的角度（認為時間是一種「社會事實」(social fact) 或集體再現，是被社會建構的，但卻對人們的行動具有外在強制的作用）、關係的角度（認為時間不是實體的存在，而是一種安排社會事件的關係模式），以及相對主義的 (relativistic) 角度（認為不同的社會、文化、時代有不同的時間概念與形式）(Sztompka 1993: 53)。涂爾幹在世前後，他的時間研究取向為 Marcel Mauss、Henri Hubert、Maurice Halbwachs、Marcel Granet 所繼承，成為法國的重要研究傳統。不過在他之後，與其他領域比較，在 70 年代之前，社會學的時間研究進展緩慢 (Hassard 1990: 2; Bergmann 1992: 82; Sztompka 1993: 53)。

自涂爾幹以來，社會學的時間研究，或者說社會學家將時間帶入研究的方式，可以大致區分為三類。<sup>7</sup> 第一類，將近一個世紀以來，雖然社會學家對於涂爾幹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的時間理論，不斷有所批評、損益，但迄今主要的時間社會學的研究，基本上仍然反映了涂爾幹所開拓的研究方向，以及上述 Sztompka 所歸納的三個特點。這方面的時間社會學研究，在於探討不同社會、文化、時代、情境下「社會時間」(social time) 的客觀安排，以及人們對這些時間建構的主觀認知。在 70 年代之前，這包括 Pitirim Sorokin and Robert Merton (1937)、Radhakamal Mukerjee (1943)、Donald Roy (1960)、Lewis Coser and Rose Coser (1963)、Wilbert Moore (1963)、Georges Gurvitch (1964) 等人的重要研究。不過，一直要到 70 年代之後，時間社會學的研究才有顯著的進展而大量出現。70 年代之後所出現汗牛充棟的時間社會學研究，不管是偏重概念

7 這三類區分是筆者基於本文問題意識所做的歸納。其他研究者對時間社會學研究的分類，可參見 Elchardus (1988: 35)、Bergmann (1992)、Flaherty (2005: 291) 等。

與理論的探討，或者針對特定的經驗現象，大多屬於這個「社會時間」研究的大範圍 (Hassard 1990: 2; Bergmann 1992: 82) (例如：謝國雄 1997: 105-145；2003: 201-203；鄭作彧 2010；Hall 1979；Zerubavel 1979；Lewis and Weigert 1981；Hinrichs et al. 1991；Elias 1992 (1987)；Negrey 1993；Moen 2003；TenHouten 2005)。

第二類社會學的時間研究，或者說社會學家將時間帶入研究的第二種方式，在於討論時間因素在社會學理論建構與方法論中的重要性，澄清時間在理論建構中的可能角色與作用，以建構更恰當的社會理論。<sup>8</sup>在這方面，Anthony Giddens 的「結構化」(structuration) 理論，旨在「破除共時的 (synchronic) 與歷時的 (diachronic) 對立分裂」(Giddens 1981: 29；另參見 Giddens 1979: 198)，是一個顯著的例子。<sup>9</sup>在歷史社會學中，長久以來備受關注的討論議題，包括對於時間性、路徑依賴 (path dependence)、序列 (sequence)、機遇 (contingency) 等概念的眾多討論，都可以歸入這一類的範圍 (例如 Martins 1974；Tilly 1984, 1988；Griffin 1992；Sewell 1996；Jensen 1997；Mahoney 2000；Abbott 2001)。

如果說上述第一類的时间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實際的社會生活與人群，探究時間觀或時間的參考架構在其中的性質與作用，那麼第三類的研究對象，則是社會學家本身，企圖分析社會學家本身的时间觀或時間的參考架構，以及這些時間觀或時間的參考架構與他們的知識建構的關係。如果說第二類的研究著眼於方法論，目的在於強調時間在經驗研究與理論建構中的重要性，以追求更恰當的社會解釋 (explanation)，那麼第三類的時間社會學研究，則在於詮釋 (interpret) 社會學家與其知識建構中的時間觀，以及這些時間觀所隱含對社會學家本身的意義，或是與更廣大的政治、文化脈絡有關的意涵。第二類的時間社會學研究企圖對時間做更佳的概念化，建構更恰當的社會理論；而第三類的研究則毋寧是一種「社會學的社會學」(a sociology of sociology)，反身性地剖析與時間有

8 參考 Bergmann (1992:123-125)。

9 其他研究如 Segre (2000)、Šubrt (2001)、Cicchelli et al. (2006)、Hitlin and Elder (2007)。

關的認知架構如何形塑（大部分的時候在於指出其如何限制）社會學家及其知識建構。<sup>10</sup>

不過相對於前兩類，第三類的研究相當稀少。一個早期例子，是 Robert A. Nisbet 在 1969 年出版的 *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 Aspects of the Western Theory of Development* 一書。Nisbet 從語言的核心要素之一——隱喻——的角度，分析時間概念對古希臘以來西方社會思想的重要形塑作用。Nisbet 指出，隱喻不僅是經驗帶來的結果，而且更經常是經驗的先決條件；隱喻不僅幾乎先於人們的經驗，而且可以引發經驗。活躍的思考與具有創造力的心靈，通常無法脫離隱喻，亦即經常呈現一種對於新事物或過程的直觀的、圖像式的 (iconic)、總括的掌握理解，將兩個分隔的經驗領域瞬間地融合為一個具有啟發性的、概括的意象 (Nisbet 1969: 4-5)。

Nisbet 認為，在論及人類與文化的西方思想中所運用的隱喻，最古老、影響最大且涵蓋最廣的，是關於社會「成長」(growth)的隱喻 (Nisbet 1969: 7)。他的 *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 一書，即在於分析「成長」隱喻如何形塑古希臘以來西方關於人類社會變遷的社會思想，包括孔德、馬克思、Herbert Spencer、Alexis de Tocqueville、Talcott Parsons 等預設人類進步與社會演進的理論。Nisbet 指出，18 世紀以來西方學者喜歡談論人類的進步、社會的演進、文明的歷史等，他們訴諸的隱喻就是生物有機體的成長發展；這些理論經常出於西方中心主義，用「古代、中古、現代」的簡單區分來編排、講論複雜多變的人類社會或文明 (Nisbet 1969: 240)。

Nisbet 分析社會學家等對於與時間有關的認知架構如何透過隱喻，形塑了社會思想或社會學知識的建構，這可以說是一種反身性的研究。就本文的問題意識與研究重點來說，Nisbet 在 40 年前的研究取向與分析

---

10 關於這種反身性的或反思的社會學觀點，參見 Bourdieu (1990[1982])、Wacquant (1992: 36, 40)。

角度相當有啟發。誠如他指出的，隱喻的使用在社會科學關於社會變遷的研究中最為常見(Nisbet 1969: 7)。台灣 60 到 70 年代圍繞在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研究，正有相當類似的狀況。如同葉啟政已經指出的，60 年代台灣社會科學界開始的現代化研究所根據的現代化理論，具有某種特定的「歷史哲學」，是優勢的現代西方文化擴散所造成的典範。不過筆者在前面也強調過，這個時期台灣關於中國現代化的研究，不只倚賴西方的現代化概念與理論、呈現世界朝向現代化變遷的時間架構，更往往具有鮮明的中國民族主義，以中國傳統社會朝向現代化變遷的時間架構來鋪陳論述。推動這種知識建構的兩代外省籍研究者親歷 20 世紀上半葉中國的動盪不安，在國仇家恨中流亡來台，承載現代中國內憂外患造成的文化創傷。他們幾無例外，渴望傳統中國能透過現代化而強大。做為當時台灣政治與文化上「中國現代化」論述的重要部分，他們的社會科學研究，與這些流行的論述一樣，往往將「傳統」與「現代」二分。這兩個概念都分別被用來包含不同時空、廣大紛雜的事物，提供人們一種直觀的、圖像式的、總括的掌握理解，具有引導人們經驗、塑造特定感受的作用。傳統與現代，可以說是 60、70 年代普遍的中國現代化論述或是社會科學的中國現代化研究中最核心的概念，具有類似 Nisbet 所謂的隱喻的作用。它們使人們方便從自認為已知的「傳統的」或「現代的」性質來理解未知的事物，鋪陳一種特殊的時間架構，塑造人們的時間感或歷史意識，提供人們看待中國（尤其是台灣做為自由中國）社會變遷的視野。本文從敘事的角度來探討台灣社會科學的中國現代化研究，著眼於知識建構隱含的時間認知面向與作用，可以說類似 Nisbet 的探討，是一個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的反身性研究。

#### （四）社會學的敘事研究、敘事中的時間及認同、知識建構的敘事性

不過自涂爾幹以來的上述三類時間社會學的研究，幾乎都忽略了敘事對「社會時間」建構所可能具有的重要性。以 John Hassard 在 1990 年

編輯出版的時間社會學重要研究文獻的第一本選輯為例，其中沒有觸及敘事的文章 (Hassard 1990)。另外，以 70 年代之後時間社會學領域幾乎最重要的兩位學者——Eviatar Zerubavel 與 Barbara Adam——所累積的一系列研究為例，時間社會學研究對敘事的忽略，更為明顯。Zerubavel 自 70 年代末以來致力於現代社會時間標準化的研究 (Zerubavel 1979, 1981, 1985)，但一直到較晚近的研究，才論及集體記憶、社會對「過去」(the past) 的形塑與時間的相互關係等議題，並且開始運用敘事的概念 (Zerubavel 1997: 88, 98; 2003: 13-14)。至於 Adam 研究生命階段、學校生活、工作場所等與時間的關係，或者綜論社會理論與時間的關係 (Adam 1990, 1995, 2004)，幾乎完全沒有論及敘事。<sup>11</sup> 另外，在歷史社會學領域中，確實有不少關於敘事的研究，但其重點仍屬於上述第二類時間社會學的範圍，亦即一種方法論的關懷：在企圖將時間因素帶入經驗研究與理論建構上，敘事做為呈現歷史社會學研究結果的書寫方式，可能扮演什麼角色與作用？如何達到理想的目標（例如：柯志明 2005；Griffin 1995；Gotham and Staples 1996；Calhoun 1998）？

不過，即使時間社會學的研究忽略了敘事與人們的時間感知、社會生活的時間架構等的關係，並不代表時間社會學者完全未曾注意到與敘事相關的現象及其重要性。例如 Michael Flaherty 研究人們的時間經驗，在 *A Watched Pot: How We Experience Time* 一書開始就提到：

人類的特別之處，一部份是因為他們能夠融合異質的事件而達成連貫一致的持續感。我們可以藉著記憶過去、從現在回想、以及預料未來而注意到變遷。我們的時鐘與日曆標誌時間，但他們並沒有製造時間。只有人類可以透過反身性的「意識的統合」(reflexive “unity of consciousness”) 而篩選過濾零碎片段的經驗動態，因而製造時間。(Flaherty 1999: 1-2)

---

11 Barbara Adam 大致只在最近著作裏的一個段落中簡短地論及敘事 (Adam 2004: 97-98)。

Flaherty 的全書沒有論及敘事，然而他上述的這段話所指涉的，正是人類相當普遍的對自我與外在世界的「敘事的理解」方式，以及由此而建構的時間存在感（見下文的討論）。再以上述的 Adam 為例，雖然她幾乎沒有討論敘事與時間的關係，但也注意到不管是用寫作或電影等不同的方法敘事或說故事，人們可以改變事件的序列與所持續的時間，充滿創造力地重新安排過去、現在、未來的關係 (Adam 2004: 97-98)。至於在時間社會學中研究範圍幾乎最廣泛、最具影響力的 Zerubavel (Flaherty 1999:10)，如同上述，則一直到晚近分析集體記憶等現象時，才開始從敘事的角度切入。Zerubavel 正確地指出：

人類記憶最顯著的特徵之一，是我們在心智上將基本而言沒有結構的事件系列，轉變成表面上看起來連貫一致的歷史敘事 (historical narrative)。我們通常將過去的事件看成是一個故事中的一幕一幕 (episodes)，……而基本上是這樣的「故事」讓這些事件在歷史上變得有意義。

……為了要讓歷史事件變成像故事一般的敘事，我們要能夠想像這些事件之間有某些關連。確立這種明白無誤地構想而得的關連性，正是必然屬於回溯性的心智過程的情節化 (emplotment) 之核心。確切而言，正是透過這種情節化，……我們才經常有辦法對過去的與現在的事件賦予歷史的意義 (Zerubavel 2003: 13)。(粗體字為原文的強調)

即使有像 Zerubavel 如此居於時間社會學研究領導地位的學者開始從事敘事研究，但是整體而言，對於敘事在時間社會學研究中的重要性的關注，至今仍相當缺乏。如果對照 90 年代以來敘事的社會學研究的快速發展，<sup>12</sup> 那麼時間與敘事的社會學研究兩個領域之間的隔閡，就更加明

12 例如 Alexander (2003)、Chase (1995, 2005)、Chase and Rogers (2001)、Edmunds and Turner (2002)、Ewick and Silbey (1995, 1998, 2003)、Holstein and Gubrium (2000)、Jacobs (1996)、

顯。再看看近二十幾年來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界在「敘事的轉向」(the narrative turn) 後蓬勃出現的種種關於敘事的研究,<sup>13</sup> 那麼時間社會學者對於敘事的疏忽, 多少令人驚訝。如果我們又進一步回顧哲學家 Paul Ricoeur (1984[1983], 1985[1984], 1988[1985])、Alasdair MacIntyre (1984)、David Carr (1986) 與心理學家 Jerome Bruner (1986, 1990, 2002) 等研究時間與敘事的密切關係且影響重大的著作, 那麼時間社會學者長久以來對於敘事的輕忽, 就更加難以理解。與各學科或領域(包括社會學本身)的敘事研究比較, Zerubavel 的敘事概念化就不免顯得簡單粗略。

60 到 70 年代針對中國現代化議題的社會科學研究中, 時間架構與歷史敘事的密切關係, 反映了敘事在人們社會化、理解自我、掌握行動與經驗的意義、集體認同發展、文化建構上的重要作用。敘事做為特定歷史條件下人們反身性的思考與社會建構的產物, 它所呈現的時間參考架構, 不是鐘錶日曆等所精確計算的「自然時間」, 而是屬於人們反身性的思考與社會建構產物的「人的時間」(human time) 或社會時間。人們的自我理解, 與這種「人的時間」有密切關係, 而敘事或說故事無疑是表達這種時間感的最主要過程與結果。從「敘事認同」(narrative identity) 的理論角度來看(見下文的討論), 人的時間, 可以說是敘事化的時間。就像 Ricoeur 所言, 敘事或說故事的活動與人類經驗的時間性質兩者之間的相互關連並非偶然, 而是跨文化的必然現象。人們以敘事的方式組織時間, 使時間變成人的時間, 而敘事也因為描述展現人們的時間經驗之特徵而富有意義(Ricoeur 1984[1983]: 3, 52)。Donald E. Polkinghorne 的一段話, 簡要地闡述了敘事的本質、作用, 以及它與人的時間及認同建構的關係:

---

Jacobs and Sobieraj (2007)、Loseke (2007)、Maines (1993, 2001)、Orbuch (1997)、Plummer (1995)、Polletta (1998a, 1998b)、Polletta and Lee (2006)、Riessman (1990, 1993, 2008)、Smith (2007)、Somers (1992, 1996)、Somers and Gibson (1994)、Townsend (2001)、Yamane (2000)等。

13 參見筆者先前研究的討論(蕭阿勤 2010: 34; 2015)。

一般說來，敘事是一種認知的結構形成 (cognitive structuring)，它運用情節化的配置佈局之特性 (configural properties of emplotment)，將行動與事件組織成時間的整體。這個過程藉著確認事件在結局中的角色，以及事件對促成結局的作用，而將意義賦予這些事件。敘事的結構形成是一種回顧追溯所產生的運作，以便使那些在前敘事層次 (prenarrative level) 原本看起來有意義的行動與事件，充分實現其可能潛在的敘事的意義。敘事的結構形成之結果是敘事的產物，這些產物在其構成上利用文化的情節與特性塑造 (cultural plots and characterizations)。……**敘事化 (narrativizing) (動詞) 的反思過程製造的產物，是敘事或故事 (名詞)。**敘事的認知過程的結果是故事，而故事可以發揮作用，給自我帶來整合的認同，給一個人的行動與生命經驗帶來意義。(Polkinghorne 2005: 5, 10-11) (粗體字為原文的強調)

換句話說，敘事或故事，指的是一種特殊的論述形式。這種論述，不管是口說的或書寫的，通常以清楚的開頭、中間、結尾的時間序列 (sequence) 來有秩序地交代、說明生活經驗或事件。開頭、中間、結尾的序列安排，使生活經驗或事件的陳述具有「情節」(plot)，這是敘事最基本的特質。「情節化」或「情節賦予」，是使生活經驗或事件的陳述具有「敘事性」(narrativity) 的核心要素。情節化將經驗或事件轉變成連續故事中的一幕又一幕，讓這些獨立的部分各得其所，也使敘事的各部分互相連貫，成爲一個具有意義的整體。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講述故事時不斷使用的「然後…」、「所以…」、「接著…」等來達到順暢的轉折與連貫，或者用「然後呢？」、「所以呢？」、「接著呢？」等來要求講故事者的合理交代，正是來自對序列、情節、秩序、意義等敘事要素的相當根本的直覺，反映人們非常普遍、近乎本能的渴求。雖然人們口說或書寫的溝通，並非都憑藉敘事，而口說的或書寫的文本，也不一定都

屬於敘事的性質 (Riessman 2008: 5)，但如同心理學家 Jerome Bruner 所指出的，敘事的理解是人們認知運作與思考的最基本模式之一。<sup>14</sup> 敘事是創造意義的重要憑藉，也是人們建構文化的重要方式（蕭阿勤 2015）。

上述 Polkinghorne 的一段話，也同時清楚闡明「敘事認同」的理論要旨，亦即人們通常以敘事的方式來理解自己的生命，因而確認他們的自我及其在世界的定位。或者更精確地說，人們詮釋自己的生命，將其生命經驗轉變成敘事，而當成敘事來理解的生命就構成人們的自我理解 (Simms 2003: 80)。敘事與認同兩者，相生相成、彼此建構（蕭阿勤 2010: 39-48）。不過就像 Polkinghorne 所指出的，敘事的產物在其構成上乃利用文化的情節與特性塑造，因此即使是個人的生命故事，也很難說是完全出於個人的單獨創造而自足封閉。個人所建構的生命故事，通常涉及許多更大的、關於某種集體的公共敘事，由這些公共敘事所交織而成，以它們為重要的參考架構。關於中國自 19 世紀末以來飽受外國強權欺凌、內憂外患交迭、國困民窮而充滿國族文化創傷的敘事，深刻影響在 60 到 70 年代圍繞著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知識建構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兩代外省籍研究者，並且形塑他們的國族集體認同。

筆者在先前的研究曾指出，晚近許多學科或知識領域對於人類經驗本體上的「敘事性」，以及對於故事在社會生活中基本重要性的深化認識與研究，已擴展到對於這些學科或領域本身知識建構的敘事性的反思。許多研究紛紛指出，那些原本被認為與敘事無關或刻意避免敘事的知識建構，事實上仍然呈現人類普遍且根本的敘事理解之動態（蕭阿勤 2010: 415）。<sup>15</sup> 舉例來說，政治學者 Joshua Foa Dienstag 以洛克、尼采、黑格爾為對象，探討歷史敘事在他們三人的政治理論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

---

14 Bruner 在 1980 年代以來關於敘事心理學的著作影響廣泛，他指出人類有兩種認知運作與思考的模式，其中之一是敘事或說故事的方式，另一種是形式科學的邏輯論證結構。Bruner 強調，這兩種模式雖有互補，但不可相互混淆，因為兩者各有其組織經驗、建構現實的獨特方式，而其運作結果合理與否的判準、對因果關係 (causality) 的概念等都不同 (Bruner 1986: Chapter 2)。

15 參見斯特拉斯曼 (Diana Strassmann) (1997[1993])、Edward M. Bruner (1986)、Dienstag (1997)、Landau (1991)、Nash (1990)、Polkinghorne (1988) 等。

我們必須探究他們藉著歷史敘事所建構的時間感，才能更瞭解這些理論家本身及其理論；他們對過去的理解、對未來的期望，形塑他們自己當下的認同，也道出了他們塑造讀者認同的企圖。Dienstag (1997: 3-4) 認為，瞭解這種情形，我們會更加掌握自我與時間兩者關係的重要性。Dienstag 如此強調：

我主要的論點認為，政治理論並非依賴抽象的權利與義務的概念，而是經常藉著提供一種特殊的時間感來試著引導讀者。那種時間感不只靠邏輯來說服，也用一種更令人信服的歷史陳述、以及對讀者將要扮演的特殊角色的說明來說服。這種情形的一個主要影響是：如果我們接觸每一本政治理論著作時，只是要找出抽象的論點，那麼我們就是束縛了自己的詮釋的能力。如果我們考慮那些不涉及歷史變化的推理的可能性時，也考慮那些關於歷史的論點的可能性，那麼我們的閱讀理解會更豐富而有所得。政治理論論及過去與未來的問題，要比別人有時候讓我們以為的還多。換句話說：政治理論的事業往往與其說是改造我們關於是非的準則，不如說是改造我們的記憶。(Dienstag 1997: 3)

就像 Nisbet (1969: 6) 指出「隱喻與社會行動的提案有相當的關連」一樣，歷史敘事隱含了對於讀者行動角色與方針的期望與暗示，而這正是上述 Dienstag 的論點的意涵。就本文的問題意識與研究重點而言，Dienstag 的論點深具啟發性。本文的研究旨趣是，探討 60 到 70 年代兩代外省籍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圍繞著中國現代化的知識建構與時間、敘事的關係，分析他們身為流亡者，如何以特定的歷史敘事建構特殊的時間感，既確立他們本身的認同、知識的內容與意義，也嘗試形塑讀者與國族有關的集體記憶與集體認同、指引他們的行動。不過由於本文篇幅有限，因此僅以龍冠海的研究為例來釐清上述的論點。

## 四、流亡情境與中間狀態：龍冠海的例子

如同前面提到的，親身經歷戰亂，離鄉背井而渡海流亡的痛苦經驗，對於在 60、70 年代圍繞著「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研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兩代外省籍學者的個人生命，以及他們的知識建構，都具有深刻影響。身為「台灣社會學界的開山始祖」的龍冠海，<sup>16</sup> 正是其中第一代流亡者的典型。他的例子，充分展現流亡經驗對來台後生活與學術知識的重大影響。

龍冠海在 1906 年生於海南島的鄉村，家中半商半農，在傳統私塾短暫學習後，接受了新式的小學教育，但因家貧而輟學。他後來到南洋投靠叔父，並到新加坡就讀中學，接著在 1923 年考入為留美做準備的清華學堂。1929 年，龍冠海赴美留學，並於 1931 年入南加州大學攻讀社會學。<sup>17</sup> 就一般人們而言，通常在青春期末到成年早期，大致確立了形塑往後生活的世界觀。這個生命階段的龍冠海，亦即從 17 歲入清華學堂到 23 歲出國，正是 20 世紀初中國變亂相乘、動盪不安的時期。龍冠海後來追憶，1931 年發生「九一八事變」，亦即日本關東軍在瀋陽附近製造事端、開始侵占中國東北，在美國的他「真是怒髮衝冠，憂心如焚。日夜所思，只為如何驅除倭寇，挽救國家於危亡」（龍冠海 1964: 37）。於是他和一些留美同學與華僑組織「支援祖國」的委員會，並且屢次應邀演講，也親自寫信給外國重要人士，努力為中國宣傳與辯護。他同時致函許多國內若干黨國要人，呼籲他們以國為重、團結禦侮（龍冠海 1963a, 1964）。<sup>18</sup> 此外，由於龍冠海認為中國人「人格道德的墮落」，是「中國內亂和政治腐敗的最大原因，也是中國前途的最大危險」，因此又與國內外朋友發起「人格培養同盟」，由他起草宣言，呼籲「提倡新的進

16 這是葉啟政 (1984[1983]a: 5) 在龍冠海辭世當年稱頌他的用詞。

17 這裏關於龍冠海的生平介紹，參考龍冠海 (1974[1972])、張承漢與林義男 (1982)、章英華 (1991: 41)。

18 同時參見章英華 (1991: 42)。

步的道德觀念和培養健全的國民人格」，以便使「我們的國家民族在世界上佔一個足以令人敬畏的地位」（龍冠海 1964: 37）。正如龍冠海來台後的學生章英華指出的，中國的動盪與落後，在他的生命歷程中扮演著相當的角色（章英華 1991: 41）。1930 年代中國內憂外患的刺激，將二十幾歲的龍冠海形塑成一位熱血奔騰而行動積極的青年。他後來回憶說「當時在外國我的這種作法，由別人看來，也許是近乎瘋狂的行為，後來我自己有時也有這樣想法」（龍冠海 1963a: 14）。

取得博士學位後，龍冠海在 1935 年回到中國，任教於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社會學系。但是兩年後中國開始抗日戰爭，戰爭結束後緊接著國共內戰，龍冠海與成千上萬的中國民眾一樣，被迫開始流亡。在輾轉中國南方各地之後，他獲得國立台灣大學（以下簡稱台大）的聘書，終於在 1950 年初左右隻身渡海來台。<sup>19</sup>除了台大之外，他也曾任教於台灣省立法商學院（國立中興大學前身）、東海大學。1951 年「中國社會學社」在台重新登記恢復後，他也曾經擔任過理事長。<sup>20</sup>龍冠海與楊懋春等人努力奔走，終於在 1960 年於台大成立社會學系，成為創系的系主任。1971 年 10 月，中國社會學社開始出版《中國社會學刊》，他擔任創刊號的主編，並撰寫了〈發刊詞〉（龍冠海 1971）。

由於史料的限制，我們無法得知龍冠海來台初期的心境，只知他似乎沒有多久就重拾心情，在百般困難中，認真面對自己的社會學志業。來台大約兩年之後，亦即 1952 年秋天，龍冠海的《社會學講話》由國民黨的「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列入《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

19 張承漢與林義男 (1982: 224) 的「龍冠海教授事略」記載他在 1949 年隨政府遷台，但是龍冠海自己則說「迨三十九年 [1950 年] 春始得台灣大學之聘，轉移來此」，亦即來到台灣（龍冠海 1954[1952]: 1）。參見本文後面所徵引的龍冠海的自述。

20 關於在台灣「復社」後的「中國社會學社」的發展，參閱顧忠華、張維安 (1991) 的研究。這兩位作者指出，從 1951 年到他們撰稿的 1991 年左右，這四十年間關於學社的檔案等各種資料並不多，因此他們對於這段歷史，只能做「不完整的整理」。他們指出，「關於遷台後的中國社會學社的人事組織，因為資料欠缺，無法詳細的表列。」他們雖整理出學社的「歷屆組織系統表」，但也說明恢復後的學社「因制度尚未確立，屆數之計算相當紊亂」，「早期的屆數與年代不盡可靠」。根據這個不完整的表，龍冠海至少擔任過第七屆理事（年代不詳）、第八屆理事長（1968-1970）、第九屆理事（1971-1973）、第十屆監事（1974-1977）、第十三屆監事（年代不詳）等職（顧忠華、張維安 1991: 140, 144, 149-151）。

第一輯。在台大宿舍中，龍冠海寫下了這本書的〈自序〉。他說：

作者是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春開始流亡生活，從南京、而杭州、而上海、而廣州、而香港、而瓊州，迄三十九年〔1950年〕春始得台灣大學之聘，轉移來此。來時可說是赤手空拳。過去約二十年內所收集關於社會學的資料差不多全都散存京杭等地，不但自己的書一本也沒有帶來，連歷年讀書筆記及所寫稿件十分之九也未曾携來。故抵此後只好重振旗鼓，幾乎一切又須從頭做起。這是作者寫這本東西時感覺困難之一。台大因無社會學系，關於社會學的圖書雜誌，無論中英文的，都相當缺乏，尤其是新的更為難得。台大如此，本省其他地方當然更不易找。（龍冠海 1954〔1952〕：1）

即使艱困如此，龍冠海畢竟完成了總共 10 章、235 頁的專著，並且將它定位為「一本普通社會學，社會學概論，或社會學原理」（龍冠海 1954〔1952〕：1）。這是龍冠海在台灣所出版的第一本社會學專書，應該也是戰後台灣的第一本社會學專著。<sup>21</sup>書中各章內容涵蓋了社會學的性質、範圍、研究法，以及社會生活與地理環境、生物因素、個人、文化的關係，加上社會結構、社會互動、社會變遷、社會控制與導進的議題。這本書既展現了龍冠海對社會學的理解，而對照他接下來的著作，它事實上也已經鋪陳了他後來在台灣的社会學研究的基本思路。

60 年代初，英國出版的《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刊登了關於台灣的專題文章，其中署名 Wen-li Mei 的作者，論及第一代外省籍知識分子流亡來台十幾年的生活，如此描寫：

---

21 基於這個原因，筆者認為龍冠海的這本專著，即使是將近一甲子前的舊作，但它的實質內容與歷史地位，都應該受到更多的重視。

隨著國民黨的垮台，大多數逃離大陸的知識分子已經喪失自信，在他們原本受訓練培養而過的那種生活中，他們已找不到意義。他們能做的，頂多就是懷抱著返回大陸的神話。這些知識分子來到台灣時，並沒有準備要長久流亡。許多人還重視歸鄉老死的中國傳統。「樹高千丈，落葉歸根」。不少人認為在被「竊據」的大陸比在台灣有更多的機會。有些人替目前在島上令人不滿意的狀況找藉口。一旦回到大陸，民主會實現，稅賦會寬減，而世界會變好。國民黨培養這種神話，而這種神話在許多方面是國民黨的存在理由。對蔣介石來說，看起來對其政權的意識形態再加斟酌，只會導向危險的途徑。教條是必不可少的風尚流行。(Mei 1963: 66)

Mei 描述的，正是前面所討論的流亡者的典型——他們有著深沈的失落感，懷念故鄉而難以完全接受新家，活在中間狀態而始終等待，企盼故鄉的惡劣狀況一旦改善就可束裝返鄉，而龍冠海正屬於這一代。不過在《社會學講話》的開頭，龍冠海闡釋社會學的性質與研究對象時，開宗明義地申論道：

自從法國孔德 (Auguste Comte) 在一八三九年發明「社會學」這個名詞並將社會學列為一門獨立的科學之後，一百多年來，由於各國社會學家的努力結果，這門學問已經漸漸的被發揚光大，而在社會科學當中佔了一個最重要的地位並成為一門最基本的學科，同時也是人類知識當中最不能缺少的一種。因為人是個社會動物，他時時刻刻都不能離開社會，他的一切活動都與社會息息相關；要想好好地在社會裏生活，關於社會的知識就不可不有。蓋了解社會就是了解自己，了解別人以及自己所處的環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控制自己，管制別人，統制社會。  
(龍冠海 1954[1952]: 1)

相對於 Mei 所描述的第一代外省籍知識分子普遍的消沈，龍冠海的這段話，透露了他對於自己所投注的學術志業的社會價值，充滿肯定與信心。流亡異鄉兩年，《社會學講話》顯示的是他對於自己身為社會學者的存在意義，仍然非常肯定而清晰。從 1960 年台大社會學系成立開始，龍冠海擔任系主任，更幾乎投注了他的大部分心力（章英華 1991: 42），成為他生活的重要寄託所在。1967 年入學的蕭新煌，曾經形容道：「龍老師在台灣沒有自己的家，卻把社會系當做一個家來辦。對學生，自然也就看成是子女」（蕭新煌 1983: 54, 1984 [1983]: 3）。

當時與龍冠海等人一起努力奔走籌設台大社會學系、同屬來台第一代外省籍社會學家的楊懋春，對他有近距離的觀察，讓我們對龍冠海的流亡情境，有更細緻的瞭解。楊懋春曾經談到龍冠海，娓娓道來，值得詳細徵引。他說：

龍教授在大陸時，久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社會學教授。他是美國南加州大學社會學博士。到南京金女大任教時，大概是中年期。該時社會風氣尚十分保守。未屆老年期的男士在女子大學為教授，在語言與行動上處處要謹慎。必須態度嚴肅，不苟言笑。師生間關係必須有段距離。一位未婚男士身在女兒群中，反找不到一位小姐，而遲遲未婚。龍教授在金女大任教日久，自然就養成了道貌岸然，不苟言笑的性格與形象。到了台灣後，因親友離散，生活艱苦、心情低沈，他的嚴肅更加凝結。不僅自己不能言笑自如；同事朋友在他面前講談諧話，或說個不傷大雅的笑話，他也不能欣賞，至多裂裂嘴而已。他住在一間老舊陰暗的單身教授宿舍內。家具簡陋得幾乎等於無。用個簡單古老小電爐與一個搪瓷鐵鍋，煮極簡單的麵條或飯菜。有一個盪與一雙筷，孤獨的自吃三餐。天天如此。我到他住處看望。適值天氣陰冷，空氣悶塞。見到他的這種生活情況，不能不深為嘆惜，對他有很深的同情，我曾多次在其研究室中，試著與

他暢談，並想夾帶上幾句趣語。希望使他的心情輕鬆，精神活潑。但無何效果。因為他尚未結婚，我也想用為他介紹女朋友的話，引他開朗，表現輕鬆。也不發生效力。似乎只能與他談社會學系的學科事，或社會學的研究事。知道他這種性格後，我就在每次與他會面，只論如何發展台大社會學系、如何開始社會學系的學術研究等嚴肅題目。（楊懋春 1989 [?]: 58）

龍冠海在台灣的生活，固然因為他的本身性格與早年在金陵女子大學養成的習性使然，但如同楊懋春的追憶所透露的，即使他有所寄託，致力於學術與知識，但終究難免流亡情境的苦寂。四十幾歲來台、五十幾歲開始投身於台大社會學系系務的他，很明顯抑鬱寡歡，與 30 年代時熱血救國、幾近瘋狂的二十幾歲青年，已經大不相同。

雖然龍冠海沒有留下類似前面提到的伊朗裔美國社會學家 Shahidian 的細膩自述，但是楊懋春對他的描寫，讓我們窺見他的具體生活梗概，也足以讓我們揣摩他隻身流亡，或許也有著類似 Shahidian 的經驗。更清楚的是，就像絕大多數他那一代的外省籍知識分子一樣，龍冠海始終沒有放棄回鄉的可能，渴望有朝一日能重返大陸。來到台灣兩年，在他展現對社會學志業的信心、肯定社會學者存在意義的《社會學講話》一書的〈自序〉中，敘述了流亡中寫作的困難與書中難免的缺點之後，他強調「作者自己更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凱旋大陸後能有機會再予補充之」（龍冠海 1954 [1952]: 2）。事實上，龍冠海不僅將個人志業的重整，更將整個「中國社會學」的前途，寄託於不久將來的勝利還鄉。1953 年，亦即《社會學講話》出版的隔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談到，雖然中國社會學目前「遭遇了空前的災難」，但他相信它的前途還是非常光明，「因為將來收復大陸之後，無論從社會國家需要或中國社會科學之建立來講，社會學總是不能缺少的，因此，它可以有許多發展的機會」（龍冠海 1964 [1953] a: 94）。但 10 年之後，國民黨政府已表明放棄主動使用武力以反攻大陸，許多外省人更確定歸鄉無望而失望消極。龍冠海則已經如王洪

鈞所形容的，昔日的「中年已成白髮」。不過即使如此，在 1963 年《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的創刊號中，龍冠海發表〈社會學在中國的地位與職務〉一文，仍然認為：

無論如何，我國社會學的前途完全有賴乎我們國家的前途，而我們國家的前途又完全有賴乎收復大陸，剷除共黨政權，而發揚我們立國的宗旨，即建立三民主義的，也就是自由民主的國家。如果我們孤守在這個寶島上，我們大家一定是沒有什麼前途的，我們的社會學當然也不會有什麼前途。這並非說社會學在台灣沒有發展的餘地或沒有研究的機會。事實上，它尚有發展的可能，也有很多東西值得它去研究，但究竟是有限度的。僅就社會學系畢業生來講，他們目前的出路就有了問題；將來畢業人數愈多，問題也就要愈嚴重。這種現象對社會學的發展顯然是不利的。但如果我們收復大陸，將來所需要的社會學人才一定很多；如以現有的人才（包括各校主修社會學的學生在內）來看，一定是供不應求，不論是在教學，研究，或實際工作方面。（龍冠海 1963b: 16-17）

到這個時候為止來台已十幾年的龍冠海，仍然難以擺脫流亡的痛苦，難有安穩的感覺。在回顧自己的過去時，他依舊談到「由於生活的不安定，個人原有的若干研究計劃多無法實現；又由於逃難的緣故，個人在大陸時期原有的許多書籍和資料也都喪失。」他因此慨嘆「……這二十多年來都是在國家患難中度過，因此個人的生活與教學及研究工作也都受到影響；要問自己有何貢獻，更是撫心自愧！」（龍冠海 1964 [1963]: 1）。這些話語，清楚顯示流亡的烙印，難以抹滅。不過在這種心境中，他仍然堅定地宣稱：「總而言之，社會學在中國未來的地位和職務將和過去的一樣，完全要看本國的政治發展和社會結構如何而定。如果收復大陸而社會政治又是自由民主的，我們相信中國社會學的前途，和我們

國家民族的一樣，一定是光明的，其他〔地〕位將會提高，其職務也將會更加重要——這是可以斷言的，茲讓我們拭目以待」（龍冠海 1963b: 18）。

前面提到，Stroinska 與 Cecchetto 分析流亡者與時間的特殊關係時，指出他們既渴望已經失去的東西（過去），又害怕即將來臨的東西（未來），卻也不能面對現在。龍冠海對自己投入的知識志業堅定不移，在困苦中努力撰述、傳播社會學，並且以系為家，認真奉獻。<sup>22</sup>就此而言，我們很難說他無法面對現在或害怕未來。不過他確實懷想著失去的東西，渴望歸鄉。他將自己的志業、中國社會學，寄託於未來能夠收復大陸，尤其是國家與民族得以復興。對他而言，在台灣的作為似乎是一個過渡。流亡者的龍冠海，有如薩依德所說的，活在一種中間狀態：一方面努力適應現狀，一方面懷鄉而感傷；不能與新環境合一，也無法擺脫舊環境，因而處於若即若離的困境。就此而言，他仍然具有 Mei 所形容的第一代外省籍知識分子鮮明的一般特徵。同時他也非常類似上述因法西斯或納粹政權而逃難的歐洲知識分子或政治人物，亦即活在等待中、被懸而未決的中間狀態所折磨、渴望故鄉的惡劣政治情況能夠轉變而得以返鄉的鄂蘭、Brecht、Nitti 等人。因此龍冠海與他們相當類似，是典型的流亡者。從這一點來看，我們可以說，真正使他在流亡中的生命有終極寄託的，與其說是學術工作與知識追求本身，不如說是對於學術與知識在更大的國族前途中的作用與意義，懷抱著堅定的信念。正如章英華指出的，龍冠海的作為與想法，都「顯現了極其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章英華 1991: 42）。從下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帶有強烈國族認同的敘事所建構的歷史連續，無疑有助於抒解流亡者在時間上處於中間狀態的斷裂感，維持一貫的認同。他們在流亡痛苦中的自我與知識工作，也在這種敘事中找到定位與意義。

22 龍冠海於 1972 年夏辭去系主任一職，專任教授，但隨即中風在家修養。他於病中仍然在家授課，並且口述論文，由學生筆錄後投稿出版（龍冠海 1975: 2；蕭新煌 1984[1983]: 3）。他於 1983 年逝世，一生共有二十幾本著作，絕大多數是來台後的成果。見張承漢、林義男（1982）。

## 五、實證主義與歷史敘事

如同葉啓政、傅大為的研究已經指出的，60 年代之後圍繞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研究的最顯著特色，無疑是它的實證性格，亦即反映「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研究取向與知識理念。就像社會科學哲學家 Martin Hollis 指出的，實證主義一詞在哲學與社會科學中有很多用法。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它可以指用科學方法來研究人的事情的任何取向，而這些研究取向認為人的事情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可以客觀地探究。在最狹隘的意義上，實證主義指一種「行為主義」(behaviorism)，排斥所有心理資料與質化研究方法。一個不那麼狹隘而較寬廣的用詞是「實證科學」(positive science)，亦即來自討論科學知識時的一種「經驗主義」(empiricism)，這種經驗主義在對照世界的事實來檢證假設時，以觀察為核心關鍵 (Hollis 1994: 41-42)。Giddens 則在討論社會學中的實證主義傾向時，指出這種傾向包括了三種相互關連的看法。第一，認為自然科學的方法學程序可以直接適用在社會學上，人類的主觀性、抉擇、意志不足以妨礙研究者將社會行為當做和自然世界的物體一樣來處理。第二，認為社會學研究的結果可以用類同於自然科學的研究結果的方式來系統地闡述，亦即社會學分析的目標可以是、並且應該是系統地闡述「定律」(laws) 或有如定律的普遍規則，就像那些與自然事實有關的定律一樣。第三，認為社會學有一種技術的性格，提供在形式上純粹是「工具的」知識，亦即社會學就如自然科學一樣，是價值中立的，其研究發現對實際政策或對價值追求，並不帶有邏輯上既定的意涵 (Giddens 1974: 3-4)。

雖然 60 年代之後不同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圍繞中國現代化的知識建構，未必各自都完全具備上述實證主義的各種特徵，但大體而言，他們都展現上述不同部分特徵的各種結合。60 年代開始，兩代外省籍的知識菁英，做為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知識的主要建構者，幾無例外，都深具實證的知識性格。他們共享一種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哲學，而這也是

通貫 60、70 年代，乃至於 80 年代台灣圍繞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研究主流。戰後台灣的這種知識趨向，事實上反映了清末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在認識論上的重大轉變，亦即他們越來越強調科學與理性在文化生產與政治生活上的重要性。如同 Tong Lam 所指出的，旨在蒐集、發現明白可靠、可計算的經驗「事實」或真相的「社會調查」興起，是這個轉變的重要部分；而歷經五四新文化運動對「賽先生」（科學）的大力倡導，1920 年代與 1930 年代成為中國的社會調查運動最興盛的時期，對中國的文化與政治影響深遠。當時專業或非專業的學者、政府官員等眾多社會調查工作者，實地蒐集社會學、民族學、語言學、考古學、人口、經濟、歷史等方面的各種經驗資料，以尋找那些展現普遍原理的社會運作、文化型態與民族歷史的模式與邏輯 (Lam 2011: 2-3)。將這種知識文化傳播到戰後台灣而主導三十年左右的學術趨勢者，正是流亡的外省籍社會科學家。

就龍冠海而言，從他就讀清華學堂到赴美留學後返國任教，正橫跨上述中國社會調查運動最興盛的 1920 年代與 1930 年代。他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時，也正是實證主義、統計量化的社會調查主導美國社會科學的時期 (Lyman 1994: 494-495)。他畢生的學術研究，都充分反映他在學術養成階段的時代烙印。<sup>23</sup> 龍冠海在戰後台灣社會學發展中扮演開拓者的關鍵角色，既曾擔任中國社會學社理事長，又創立台大社會學系，傳道授業，著作甚多，對 60 年代之後的台灣社會學發展有重大影響。<sup>24</sup> 來台之前，他和當時絕大多數的中國社會學家一樣，希望自己的研究能裨益國計民生，有助於中國的復興強大。當時他做為發明實證主義一詞的孔德 (Auguste Comte) 的信徒，早已宗奉實證主義的研究取向。在 1943 年論及社會與社會建設的問題時，龍冠海即強調：「因為社會學家想瞭解

23 這裏關於龍冠海的實證主義知識立場的源起脈絡，來自審查人之一的提問，謹此致謝。

24 本文初稿的審查過程中，本論文集編委會曾建議筆者進一步說明龍冠海的學術關懷與思想內容經由何種方式、對台灣社會學界產生何種實質影響等。編委會的建議，指出戰後台灣社會學史的重要研究課題與方向，但限於本文的問題意識與研究重點，加上目前缺乏可以直接援引為論據的資料，這方面的研究只能俟諸來者了。

社會，所以他和自然科學家之研究自然現象一樣，把社會現象當做一種客觀的東西看待。社會事實是什麼，他就說是什麼。他不存什麼成見」（龍冠海 1964[1943]: 100）。來台後的龍冠海，在討論社會學思想時仍然認為其特徵之一為「無偏見的——完全以研究社會事實為依歸，注重客觀，擯棄主觀，由研究事實得來的結果是什麼就說是什麼」（龍冠海 1964[1957]: 27-28）。在 1963 年《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的創刊號中，龍冠海發表〈社會學在中國的地位與職務〉一文，不僅將 1949 年之前在中國大陸發展的社會學統歸為「孔德傳統的社會學」，更將冷戰下的世界社會學二分，他認為：

今日世上社會學有二大陣營，即孔德傳統的社會學與馬克思社會學，正如在政治上有民主與共產二大陣營一樣。前者是一般自由民主國家所傳授的，後者乃一般共產國家所宣揚的。中國大陸在未被共產黨佔據以前以及台灣在光復之後所看到的是孔德傳統的社會學；可是中共奪取政權之後，大陸所行的卻是馬克思社會學。這二種社會學在其性質和目標上大有不同。孔德傳統的社會學，也就是我們所了解的以及本文所要敘述的，乃一門科學，其目的是要以科學方法去探究社會現象，以發現其共同原理法則，以資明瞭，控制，和改良社會。它所強調的是摒除成見去研討社會事實，追求社會真理，和為人類增進福利。（龍冠海 1963b: 1）

龍冠海相信，「一切科學的目的不外乎兩個：一是明瞭，二是控制，自然科學的任務是想明瞭自然的現象，找出它的原理原則，或進而控制或利用之，以改變人與自然之關係。同樣的，社會科學的任務是想明瞭社會的現象，找出它的原理原則，或進而控制或利用之，以改造社會」（龍冠海 1970 [1959]: 17）。同時也深受當時美國社會學追求科學化影響的龍冠海，強調要達到上述目標，就必須注重研究方法，尤其是社會調

查與統計。他強調：「社會調查是應用客觀的態度，科學的方法及合作的步驟，在確定的範圍之內，對某種情況或問題，作實地的考查，並搜集大量事實材料，然後加以統計分析，以資明瞭與改良該情況與問題」（龍冠海 1964[?]: 47, 1970[1965]: 49）。

然而以龍冠海為例，60年代開始興盛的中國現代化研究，事實上鑲嵌在特定的時間架構或歷史敘事。它們對科學方法、客觀中立、無成見、無偏見、重視經驗事實、追求普遍原理法則的社會科學原則等的宣稱，與特定的敘事並存交融，難以區分，而這種敘事是研究者建構本身認同與定位其知識意義的重要憑藉。就龍冠海的社會學論著來說，除了充滿當時最普遍的「傳統、現代」的二分之外，也不斷出現「中國、西方」，「共產、民主」，「孔德社會學、馬克思社會學」，「科學、感情」，「科學、偏見」，「客觀、主觀」等的對立。這些二分對立的概念，以直觀總括的意象，簡單有力地掌握龐大紛亂的事物，呈現了他的世界觀、焦慮與渴望。這些嚴格二分的認識框架，既反映國共對峙以及以美國、蘇聯為首的國際冷戰壁壘對他的學術的影響，也多少顯示流亡生活似乎更強化了他原本的實證主義的知識立場，使他更亟盼自己的社會學學術工作能有助於反攻大業與國族復興。<sup>25</sup> 不過圍繞著最核心的傳統與現代的時間性畫分，這些對立二分的概念在特定的敘事中串連起來，達成知識的建構，提供中國社會變遷的「故事」。在其中，如同前面討論敘事認同時所指出的，（國族的）公共敘事交織形塑了（研究者）個人的生命故事，而個人故事、公共敘事又滲透了知識建構。從敘事認同的理論角度來看，宣稱是客觀、中立、科學的中國現代化研究，充滿了關於認同的敘事。

最能清楚反映上述定位自我與知識意義的敘事，莫過於這些社會科學家對台灣及其現代化的討論。身為流亡者，面對陌生的土地與人民卻必須討論它們時，包括龍冠海在內的這些社會科學家跟所有的說故事者

---

25 這裏討論龍冠海的流亡經驗對他的實證主義傾向的可能影響，來自審查人之一的提問，謹此致謝。

一樣，必然面臨的第一個困難是：故事要從那裏開始講起？他們首先必須確立故事的時間架構，就像人們說故事時經常以「從前、從前…」、「有一天…」、「那個時候，我還只有 13 歲…」之類開頭一般。章英華曾概括龍冠海的社會學知識工作，指出「除了對社會學的一般性介紹之外，他的文章特別集中在人口、都市、家庭以及和這幾方面相關的社會問題，整個的研究取向還是在 1930 年代的經驗社會學的範疇之內」（章英華 1991: 44）。在人口研究方面，在 50 年代初《社會學講話》出版後沒多久，龍冠海受國民黨秘書長邀請，以「中國人口」為題撰寫專書，列入「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由於資料上的困難，「尤以關於大陸人口統計資料之缺乏為甚」，使他對這個邀請頗為躊躇。他指出，由於過去缺乏有系統的人口調查，要對大陸人口做詳盡的報導分析，絕對不可能；「再就台灣方面的來講，光復以前四十年內固然有幾次定期的人口普查，其結果也相當豐富可靠，足供參考；可是光復以後這幾年來既未曾舉辦普查，而平時的人事登記，特別是生命統計，一般卻都認為多有缺陷，而不甚可靠」。<sup>26</sup> 由於台灣在日本殖民時期的資料比較充分可靠，龍冠海決定「本書所述多半是以本省的為依據」，至於大陸方面「有則取之，否則祇好付之闕如」（龍冠海 1955 [1954]:1；1955: 7-8）。然而即使如此，這本書仍然以《中國人口》為名，在 1955 年出版。

如果說 50 年代初的《中國人口》論述台灣時，時間架構還不是十分清晰，那麼在龍冠海的家庭研究方面，則清楚顯現了從中國的過去到現在、從傳統到現代的歷史敘事。龍冠海與當時擔任台大社會學系助教的張曉春合著的〈中國家庭組織的一個研究〉，在 1967 年出版。以這篇文章為例，他們用問卷調查了九百多位大、中學生的家庭狀況，文中的討論遠溯自數千年前，指出「中國的家庭制度，自西周以來屢起變化」，尤其是「中國自與西洋交通以來，社會各方面多少都受到西方文化思潮的影響。我們的家庭制度在此潮流中也難免發生變化。」他們將調查發

26 關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 7 次戶口普查，見龍冠海 (1955: 21-22)。關於殖民時期與國民黨政府來台後的戶口普查，同時參見王甫昌 (2005)。

現放在這樣的歷史敘事情節中討論，認為當時「台灣的中國家庭組織事實上並沒有重大的變化，一般還是屬於中國的傳統家庭組織，和過去大陸未受共產黨破壞之前的可說是差不多一樣。」他們指出，「今後家庭制度的演變趨勢，核心家庭必然將更增多，因為此種家庭類型，在都市化與工業化的情形之下，乃是必然盛行的，而現今中國社會又正在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故也」（龍冠海、張曉春 1967: 118, 133）。

至於龍冠海的都市研究，則與他對台灣整體社會變遷的探討關係密切。他在台大社會學系成立後的 60 年代所致力的都市研究，尤其充滿了從傳統到現代、指向中國現代化的敘事。龍冠海在 1972 年底中風之前一年多，發表了長篇英文論文“Post-War Social Change in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1945-1969”，文中縱觀戰後台灣四分之一世紀的社會變遷，應該是最完整且全面地呈現他對台灣現代化看法的論著。他清楚界定「現代化」，認為它指的是一種社會變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發展程度較低的社會逐漸具有發展程度較高的社會的共同特色。根據這個定義，他指出過去二十五年左右的資料，尤其是最劇烈變遷所出現的經濟、政治、教育與人口四個領域的情形，都顯示主要的社會變遷潮流是由傳統到現代化，「台灣已經進入現代化的時代」，逐漸由「傳統中國」(traditional China) 變化到「現代中國」(modern China) (Lung 1971: 27, 37-43)。章英華歸納龍冠海的都市研究時，也曾指出：

對台灣的發展，他認為可以用 L. F. Ward 的社會導進 (social telesis) 的概念來描述。他以 1960 年代主流的現代化指標，認為：從人類關係的角度，是由家庭取向類型走向契約類型；從生活型態觀察，是由鄉村狀態走向都市狀態或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從社會控制的觀點，是由神聖類型趨向世俗類型。總之，主要的趨向是從傳統走向現代化，其手段是和平、漸進而民主的……。他也認為台灣的都市發展會越來越均衡……。

（章英華 1991: 48）

龍冠海提倡客觀而科學的方法，以社會調查與統計來發現社會事實、瞭解社會，並進而控制社會、改造社會。對他而言，個人的社會學志業與整體的社會學發展，無疑能貢獻於中國現代化。在 1950、1951 年之交，亦即他初抵台灣不到一年，基於過去在中國大陸的經驗，他談到「如果有人問：我國社會行政設施的最大缺點是什麼？我一定回答是調查與統計工作的缺乏。因為缺少這種工作，所以歷來所擬訂的社會建設政策和計劃有許多都是東抄西襲或憑空杜撰的。這樣做法，不但不能解決問題，而且是藥不對症，有時反足以害社會，誤國家。」對於國民黨政府來到台灣的作為，他舉例指出，如果戶政與人口調查辦理不好，就無法掌握合格選民人數，「像上一次台北市選舉市參議員的時候，報章所載，已經被槍斃了的陳儀在戶籍上尚留有他的名字，而許多活著的市民反被遺漏了，這豈不是笑話？」（龍冠海 1963[1951]a: 93, 94）。對他來說，在社會調查與統計中，人口或戶口資料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來台的最初幾年，他對於人口或戶口資料的缺乏，經常表達不滿與焦急。他強調「人口清查（或普查）是現代國家不能缺少的一種工作……因為若是沒有人口清查，任何國家的行政設施都是無所依據的。我們可以說一個國家的政治是否上軌道，大概可以從它的人口清查之有無或其辦理之完善與否以為斷」（龍冠海 1963[1951]b: 103）。對他而言，可靠的人口普查，無疑是判斷一個國家是否現代化的重要標準之一。他期盼「如能以本省為實驗，而將來將這邊辦理所得經驗應用於收復後的大陸，則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龍冠海 1963[1953]: 101-102）。然而他指出，台灣光復後「幾年來的人口登記與出生死亡的報告，因方法簡陋及辦理人員的不認真，有的又缺乏其正確性，故目前本省的人口統計數字在科學的用途上頗成問題」（龍冠海 1964[1953]b: 82）。在 1955 年出版的《中國人口》一書中，他也明白指陳，「現在台灣是反共抗俄與復興中華的基地，同時也是實行三民主義的模範省。然而與此有密切關係的人口事實尚欠清楚，這實在是一個不好現象」（龍冠海 1955: 23）。

相對於上述的不滿與焦急，來台後的龍冠海，很快就瞭解到日本殖

民統治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口資料的可貴。對於殖民政府在 1905 年到 1940 年所實施的 7 次調查，如同在上述《中國人口》一書中談到其結果「相等豐富可靠」一樣，他在許多地方都加以稱讚，指出「若以省區來講，實施過真正的人口普查的只有台灣」、「實施人口普查最久而成績也最好的唯有台灣」、「這是遠東最早的和比較合乎現代標準的人口普查」、「一般人口學家都認為是遠東各地區當中最可寶貴的資料」等（龍冠海 1955: 21, 1963[1953]: 101, 1964[1953]b: 82）。

就像對於台灣過去人口普查資料的認識一樣，龍冠海對於日本殖民統治帶來的其他方面的現代化，也有一定程度的瞭解。例如談到 1946 年到 1951 年期間台灣的文盲人數，雖然缺乏人口普查的精確統計，他指出：「但無論如何，台灣的文盲百分比一定較大陸的為低，這倒是可以斷言的，因為本省的教育，尤其是小學和中學，歷年來都比大陸的為發達」（龍冠海 1955: 98）。又例如他相當崇敬孫中山，談到孫中山倡中國優良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舊道德、強調民族自信心時則指出：

中山先生一方面雖然在讚揚這些固有的道德，但在另一方面他並沒有忘了現在中國人的許多惡德，例如隨地吐痰，不講個人和公共衛生等等。這些都是中山先生所排斥的。所以他極力勸勉同胞們一方面要保存固有的美德，一方面也應該學上外國人的優點，像講究公共衛生之類。在這裏我們又值得撫心自問一下：他的這種遺教我們現在實踐了沒有呢？在民族復興的基地各大城市的馬路有的是掛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街名了；至於公共衛生方面，人人都說是比日據時代退步；公共場所到處還是有人隨地吐痰，像這些地方又是值得我們面對著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而加以懺悔，努力反省，而痛改前非的。（龍冠海 1970 [?]: 166-167）<sup>27</sup>

27 龍冠海在 1970 年將這段引文出處的〈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偉大人格與社會思想〉一文收入論文集出版時，在這篇文章開頭說明「本文原稿為英文，於民國二十二年 [1933 年] 完

人們對行動與經驗進行敘事的理解，將這種理解組裝連繫成具有開頭、中間、結尾的時間序列的論述，亦即具有情節的敘事或故事，使它的內在各部分相互連貫成有意義的整體。在這種敘事的理解活動中，爲了概括、融合龐雜而異質的事物，追求秩序與意義，於是包含了許多對事物篩選、簡化、拆解、重組等過程。這對於政治禁忌下異己的事物，尤其如此。對於圍繞著傳統到現代、中國古代到當代、將台灣視爲現代中國的故事來說，最重大的異質部分，無疑是台灣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雖然龍冠海對於日本殖民統治帶給台灣的現代性不是不瞭解、甚至有所讚賞，但是就像他的長篇論文“Post-War Social Change in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1945-1969”所顯示的，關於台灣的中國現代化敘事，只能從1945年台灣由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與中國的銜接開始談起。前述傅大爲的研究曾指出，雖然外省籍的人文及社會科學者與中國大陸時期的學術傳統已有斷裂，但他們卻仍常宣稱繼承過去大陸的傳統，忽略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學術發展，使學術史經常都以1949年爲界的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接續來立論。這一點，與龍冠海的台灣的中國現代化敘事排除了日本殖民統治帶來的現代化，正異曲同工。1960年台大社會學系創立三年之後，在前面所提到的《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創刊號發表的〈社會學在中國的地位與職務〉一文中，龍冠海回顧過去、前瞻未來，就將中國社會學的發展過程區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清末由西方與日本傳入社會學到共產黨占據大陸，屬於孔德傳統的社會學發展階段；第二階段是共產黨占據大陸後、馬克思主義取而代之的階段；第三階段則是「政府遷台後原有社會學又得到復蘇的機會」。龍冠海放眼未來，指出在台灣的社會學任務，是「承繼過去大陸社會學的傳統，向同一目標去發展」，亦即建立中國的科學的社會學（龍冠海 1963b:16）。

中國現代化的敘事必須融合的另外一個重要的異質，是久經日本人

---

成，這二十四年〔1935年〕始寫成中文，到了十九年前〔約1951年〕又略為修改而成是篇，刊於『民權社五週年紀念文集』內，今仍照舊，只是標題稍改而已」（龍冠海 1970 [?]: 150）。據此，那麼可以推測上述引文中「在民族復興的基地……人人都說是比日據時代退步……」等文句，自然是來台後才增加的。

統治的「本省同胞」。在上述那篇縱論戰後台灣四分之一世紀從傳統到現代社會變遷的英文論文開頭，特別是針對可能的外國讀者，龍冠海刻意提醒要注意關於台灣的事實，亦即台灣在割讓給日本後，目前已歸還中國、成爲中國的一省；在日據時期淪爲奴僕的山胞與本省同胞，光復之後已經恢復自由而當家做主。在文章中談到社會流動時，龍冠海也特別談到「筆者二十一年前自大陸來台，一直定居於此地。基於實際觀察，這些年來，筆者對於本地人（包括山胞與本省人）的普遍向上流動，印象特別深刻。」除了進一步說明光復後山胞已經享有與漢人完全一樣的權利、自由流動、參與選舉等而逐漸現代化之外，他特地申論本省人的社會流動。在這部分，龍冠海首先駁斥許多西方人、特別是所謂中國專家的誤解，指出台灣人或本省人的祖先來自大陸，也是中國人，因此與中國人或外省人並非兩個不同的「族群團體」(ethnic groups)。他強調，光復後本省人不僅與其他外省人一樣，充分享有公民權；同時更由於台灣在反共鬥爭中的特殊地位，本省人做爲本地人，「他們處於更有利的位置，比大陸撤退來台者享有更多的優勢與特權。政府給他們特殊的權利，同時他們也被期望爲國家擔當特別的任務。爲了國家民族整體的利益，也爲了他們自己未來的福祉，他們非常希望能夠光復大陸。這一點，許多人經常不能理解或忽視」(Lung 1971: 7, 18-19)。

在這裏指出上述龍冠海的看法，重點在於探討知識建構中的敘事性，以及敘事認同與社會科學知識的關係。敘事的理解運用情節化的配置布局，將行動與事件組織成時間的整體。這種 Polkinghorne 所謂的「認知的結構形成」過程的產物，是例如中國現代化敘事之類的具體故事。中國現代化的敘事，就像其他集體的歷史敘事一樣，具有重要的文化結構性質與作用，形塑人們的世界觀與社會行動（蕭阿勤 2010: 8）。在實證主義引領下社會學或社會科學家宣稱客觀中立、無偏見的事實發現與研究，融會在中國現代化的敘事中，藉此達成一個有意義的整體。國族敘事提供的時間連續感、從傳統中國到現代中國的時間架構，彌合了從中國大陸到台灣的斷裂，維持那些活在中間狀態的流亡者的認同。追求未

來中國現代化的目標，更提供他們個人與社會科學研究一個重大的存在意義。

趙彥寧在分析戰後台灣具有軍人身分的流亡者自白及 50 年代具有自傳性質的出版品時，曾經指出其中所透露的對「現代化」（科技、戰爭等）的渴望——渴望現代化有助於建設國家、早日反攻大陸等，反映了某種具有特殊時間性的「流亡主體」（趙彥寧 2001[1999]: 154, 160）。她強調：

經由對科技的想望，主體於無限的流亡與延宕中將（落後的、必須被批判的、且永遠逝去的）「過去」與（進步的、不斷發展的、且可被觀想的）「未來」結合起來，其內蘊斷裂的時間被縫合，「家國之思」得以再現，「革命」的認同亦得以強化；更重要的是，這個想望也連結了似乎除了「準備」沒有太大積極意義的此刻與光榮的未來，故而提供了即時通往（其實不確定的）未來之跳板。（趙彥寧 2001[1999]: 161）

換句話說，「……透過對現代科技的觀想，以同時建構一現代性的主體、及一民族國家的認同。認同形成的過程中，過去、現在、及將來的時間差異可被連結，『國家的善』與『共匪的惡』的二元對立關係再度被確立」（趙彥寧 2001[1999]: 180）。趙彥寧研究中的外省人的身分背景，以及她所分析的經驗資料，都與本文所涉及的不同。不過龍冠海所代表的社會科學知識建構中對現代化的渴求、國族敘事所建構的時間存在感等，都與她上述的研究發現，若合符節。再者，趙彥寧在相關的研究中也洞察到：「受訪者的敘事與敘事性在相當的程度上具性別的差異性」，亦即「女性的敘事通常是斷裂的、非直線式的、與正統歷史無關的」，而「男性的敘事通常具有高度的連續性與直線性 (linearity)，其時間性 (temporality) 也多與正統的歷史性 (historicity) 吻合，而且正統歷史也是個人主觀感受到的正面價值……或失落……的最重要參考座標」

（趙彥寧 2001: 209-210）。從本文前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有關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研究，同樣充分展現了趙彥寧所指出的這種男性流亡者的敘事特質。事實上，民族主義或國族意識形態的主要承載者，通常是主宰著公共領域政治的男性，而非女性。橫跨 60 年代到 80 年代上半葉，關於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研究，可以說主要是由男性學者建構的知識天地。

前文提到，歷史上世界各地不少逃難的知識分子流落異鄉後，對於知識文化的傳播發展發揮重要作用、做出重大貢獻，但即使如此，大多數身為難民的知識分子，難以擺脫客卿從屬的地位。然而龍冠海與前述世界其他地方眾多逃難的知識分子的一個重大差異，在於他所賴以定位知識追求及個人生命的時間架構與歷史敘事，卻在台灣這個異鄉，成爲一種具有主宰地位的文化上的霸權。1990 年代以來眾多關於台灣國民黨統治、省籍關係、國族政治的研究，已經清楚指出戰後本省人在政治、文化上被壓抑排斥的情形。對本省人而言，那足以深入個人生命的底層，成爲形塑生命存在的時間感，以及追尋生命意義的重大憑藉的歷史敘事，正是戰後台灣「中國化」幾乎最爲深沈的所在。<sup>28</sup>

人們所講述、所憑藉來確立認同的個人生命故事，通常被公共敘事所交織滲透。從敘事認同的理論角度來看，敘事與認同互相形塑、互爲因果。特定的公共敘事與相關的集體認同，兩者做爲文化結構，既有助於人們製造意義、形成行動能力，但又拘束人們的認知、限制行動方式；既能鼓舞人們的熱情與創造力，也同時可能協助社會複製既有的權力關

28 對於在「中國現代化」論述相當流行的 1960 年代步入青春期與成年早期的本省籍戰後世代而言，更是如此。筆者的《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一書中有相關的討論（蕭阿勤 2010）。例如呂秀蓮（1944 年生）在 1974 年將她的報紙專欄文章集結成《尋找另一扇窗》，該書相當受歡迎而再版。在〈再版序〉中，她曾經如此表白：「……我於是更加努力於使自己做一個中國人——一個更比〔筆者按：應為「為」〕現代，更比〔筆者按：應為「為」〕邏輯，更比〔筆者按：應為「為」〕活化的中國人。或許這正是此書能引起高度共鳴的原因所在吧？斯時斯地，你我所追尋的，所需要追尋的，不正是一條現代的，邏輯的也活化的中國之路嗎？」（呂秀蓮 1974:〈再版序〉1-2）。從前面提到的民族主義、國族敘事與性別的關係來看，也許我們可以說，這樣的表白，顯示某種程度的男性化認同。

係，持續對他者的扭曲與壓抑。在戰後台灣處於優勢地位的中國現代化的敘事，也有著這類的作用。

戰後台灣社會科學的發展，深受龍冠海等流亡學者的影響。就社會學來說，1960年台灣最具規模與聲譽的大學設立社會學系，無疑是重大的里程碑。從龍冠海創立台大社會學系到1983年逝世前後，大約三十年的光陰，也正是「傳統、現代」、「中國現代化」的敘事在台灣社會一般公共論述與人文及社會科學中最為興盛的階段。除了龍冠海等第一代的外省籍學者之外，60年代開始步入學術生涯的第二代外省籍學者，例如楊國樞、金耀基等，在建構「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知識上，甚至要比第一代的學者，扮演更重要的積極角色，對一般公共論述也更具有影響力。但這已越出本文的研究範圍，只能留待後續另外探討。

## 六、結論：說故事的動物與社會科學的他者

戰後台灣社會科學的發展，深受兩代外省籍學者的影響。60年代以來，社會科學的中國現代化研究開始興盛發展。在這個潮流中，他們形塑了學術知識的問題意識、關懷重點、研究方法等，更設定了討論的時間架構與敘事模式。他們藉著特定的歷史陳述所鋪設的時間感，建構社會科學中關於台灣、中國的過去、現在、未來的集體記憶，藉此建立知識與國族的關連，以及其存在的意義。這個橫跨三十年左右的知識潮流，對社會科學研究者、社會公共論述，乃至於更年輕世代的個人志趣、集體認同、知識視野與想像界線，影響重大。仿照 Dienstag 對政治理論的說法，我們可以說，關於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研究的流行與影響，與其說是依賴抽象的概念與理論，不如說是來自它提供了特定的歷史陳述、營造了特殊的時間感以引導讀者，更藉此說服讀者，使讀者相信他們自己在中國現代化的追求中需要扮演的支持角色，因而形塑了他們的認同。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知識，與其說是彰顯了中國（台灣）的社會變遷事實，不如說是改造了人們的記憶。

如同涂爾幹所指出的，時間是人類最基本的概念或理解的範疇之一，時間的架構幾無例外地是屬於社會集體的，反映了集體生活的節奏與特質。不過時間的範疇或架構，不只有涂爾幹所關心的日期、星期、月分、年分，以及儀式、節日、公共典禮的周期等而已。就像筆者在前面討論指出的，自涂爾幹以來的三類時間社會學的研究，幾乎都忽略了敘事對「社會時間」建構的重要性。人們所進行的敘事的理解，做為一種認知的結構形成過程，屬於社會時間建構的重要活動之一。這種認知過程所造成的具體產物，亦即特定的敘事模式，以及它所營造的時間存在感、歷史意識、集體記憶等，屬於社會時間的重要型態的一部分，成為重要的文化結構，轉而又形塑人們後續的敘事理解與行動。近年來神經科學對認知的研究，從敘事結構來理解人類大腦的發展，更明確指出敘事性的知識對人們決策判斷的關鍵作用 (Thiele 2006: 201-276)。

當流亡的第一代的龍冠海等人努力研究中國（台灣）的社會變遷時，第二代的楊國樞等人也積極加入社會科學的中國現代化研究。在差不多同一個時間的 60 年代初，執教於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社會學系的 Ernest Gellner，也和 Nisbet 一樣，批評社會學等所出現的各種版本的「世界成長故事」(world-growth stories) 隱含著朝向進步的演化論等問題。Gellner 開門見山指出：

人類對於他們自己的社會的性質，通常有某種看法。對於是什麼東西確認這個社會的安排是有效的，也有他們的看法。這兩件事，亦即意象 (image) 與確認有效 (validation)，從來不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各自獨立的。

社會存在於時間中。眾所周知的，各式各樣的社會設想他們自己如何處在時間中的方式，非常不同。時間以及時間的視野被設想的方式，通常與一個社會理解本身、以及正當化本身的方式相互關連。(Gellner 1964: 1)

社會科學家身處社會，要具有 Pierre Bourdieu 等人 (1991 [1968]: 13-31) 所謂的「認識論的警覺」而與人們的常識區隔斷裂，並不容易。對於背負國仇家恨、渴望自己的研究有助於鼓舞人心、振興國家民族的社會科學家而言，他們志不在於與一般人們的認知隔離，更顯得自然而可以理解。不過無論如何，與眾多的社會成員一樣，社會學家不僅不易擺脫所處的社會時間的視野，他們本身也經常是說故事者，他們的社會科學研究也往往具有豐富的敘事性。敘事通常運用社會文化提供的情節，而個人訴說的故事往往由公共敘事交織而成，因此蘊含特定的社會權力關係。那麼透過社會科學的知識建構所講述的故事，以及所塑造的時間存在感、歷史意識、集體記憶等，也經常反映在特定權力關係下社會理解本身，以及正當化本身的方式，因而是更廣大社會的認同政治的一部分。社會科學的中國現代化知識建構，事實上正反映了國民黨統治台灣、省籍關係不平等的政治社會情境。

1970年，亦即台大社會學系成立10週年時，仍然擔任系主任的龍冠海接受該系學生所創辦的刊物《社會導進》邀請撰文，在文章中談到他要以「報告家務」的心情來「回顧過去，瞭解現在，瞻望將來」（龍冠海 1970: 1）。1975年，他因為中風而養病，在檢討自己從1935年執教於大學以來40年的學術生涯時，則談到：「一個人在人生旅途上，走了相當遠時，理當回顧一下，思考一番。究竟沿途看到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所見所為又有何意義？對同路者是否可能有些幫助？對前人或後人又是否可能有些增補或提示？否則只算是白走一趟，絲毫無意義可言」（龍冠海 1975: 1）。流亡而活在中間狀態、始終難以安穩自在的他，與眾多的人們一樣，在敘事理解的時間序列、情節化中確認自我與知識存在的意義。這不禁讓筆者想到當代著名的英國小說家Graham Swift(1949-)書中的一段話。Swift在1983年出版的小說《水之鄉》(*Waterland*)，如今已成經典。<sup>29</sup>小說的主角是東英格蘭格林威治(Greenwich)的一位中學歷

29 《水之鄉》獲得英國《衛報》(Guardian) 1983年的小說獎。這本小說的中譯，有台灣、中國的兩種版本（葛拉翰·史威夫特 1993；格雷厄姆·斯威夫特 2009）。至於改編所拍成的電影「水之鄉」，在1992年上映。

史教師 Tom Crick，52 歲的他，工作與家庭都陷入困境與挑戰。Swift 藉著描述 Crick 在困境中對自己生命歷程的回顧，觸及了時間、故事、敘事與歷史等議題。在小說中，Crick 的學生覺得歷史課百般無聊，不知道為什麼要瞭解那些過去的陳年舊事。面對那些心不在焉的學生，尤其是一位不斷質疑他、尖聲叫喊「重要的是此時此地」(What matters is the here and now.) 的學生 Price (Swift 2010[1983]: 66)，Crick 耐心地告訴學生：

孩子們，只有動物才完全活在「此時此地」。只有大自然既不知回憶，也不知歷史。但是人類——讓我給你們下個定義——是一種講故事的動物。不管一個人走到哪裏，他想留下的絕不是一團混沌，一段空白，而是能撫慰人心的故事的浮標和印痕。他只能繼續不停地講故事，他必須不停地編造故事。只要有故事存在，一切就安然。據說，即使是在人生的最後時刻，在生命隕落的最後一秒鐘——或是在淹死前——他會看見自己一生的故事在他眼前飛速閃過。(格雷厄姆·斯威夫特 2009: 55-56)

Margaret Somers 與 Gloria Gibson 在他們傑出的研究中討論 80 年代以來西方學術界敘事研究的蓬勃發展時，曾經指出：「任何知識學科都需要一個『認識論上的他者』(epistemological other)，來鞏固一個凝聚的自我認同與集體計畫。對社會科學而言，敘事的概念——由於長久以來和人文學科以及歷史專業的牽連——在充當那個角色上佔了最重要的地位」。如同許多二分對立的觀念——例如「研究特殊規律的」(idiographic) 相對於「研究普遍規律的」(nomothetic)、「特殊主義的」(particularistic) 相對於「可概推的」(generalizable)、「描述」相對於「理論」、歷史學家「只是敘事」的研究取向相對於社會科學比較嚴謹的方法等——所顯示的，敘事研究長久以來被成功地排除在社會科學認識論的合法的「認同領域」之外 (Somers and Gibson 1994:38, 粗體字為原文的強調)。如此看來，敘事被時間社會學，乃至於被廣泛的社會科學忽

略，似乎是很自然的事。那麼也許必須等到有一天，社會學家或社會科學家重新認識自己畢竟是說故事的動物，Somers 與 Gibson 所呼籲的「重新要回認識論上的他者」(reclaim the epistemological other)，才成為可能。

## 參考文獻

- 工商日報（香港），1958，〈社論〉。10月25日。
- 王永平，2005，《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洪鈞，1957，〈精神上的低氣壓〉。《文星》1(1): 24。
- ，1959，〈葡萄藤和大砲〉。《文星》5(1): 11。
- 王甫昌，2005，〈由「中國省籍」到「台灣族群」：戶口普查籍別類屬轉變之分析〉。《台灣社會學》9: 59-117。
- 中華民國年鑑社，1959，《中華民國年鑑》。台北：中華民國年鑑社。
- 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單德興譯，1997[1994]，《知識分子論》。台北：麥田。
- 朱賜麟編，2006，《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院史：1945-2005》。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 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會，1958，〈論放棄主動使用武力之承諾〉。《自由中國》19(9): 5-6。
- 呂秀蓮，1974，《尋找另一扇窗》。台北：洪健全教育文化基金會，書評書目出版社。
- 呂亞力，1987，〈我國政治學的現況與展望〉。頁629-638，收入賴澤涵編，《三十年來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回顧與展望》。台北：東大。
- 柯志明，2005，〈歷史的轉向：社會科學與歷史敘事的結合〉。《台灣社會學》10: 149-170。
- 高希均編，1973，《現代美國行爲及社會科學論文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著、郭國良譯，2009，《水之鄉》(Waterland)。南京：譯林。
- 思與言雜誌，2002，〈《思與言》與台灣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發展座談會〉。《思與言》40(4): 165-175。
- 徐蕙蘭，1982，《我國現代化過程中社會科學人才所扮演之角色》。台中：國立中興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
- 施治華，1958，〈分析中美會談結果及「不使用武力」聲明〉。《自由中國》19(9): 10-11。
- 章英華，1991，〈龍冠海教授的生平與學術——東西文化洗禮下中國社會學家的一個例子〉。《中國社會學刊》15: 41-55。

- 斯特拉斯曼 (Diana Strassmann), 1997[1993], 〈經濟學故事與講故事者的權力〉。頁 139-158, 收入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文化／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編, 《社會科學的措辭》。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 黃光國, 2002, 〈從「現代性」到「本土化」: 論「個人現代性」研究的方法論〉。頁 41-82, 收入葉啓政編, 《從現代到本土: 慶賀楊國樞教授七秩華誕論文集》。台北: 遠流。
- 黃應貴, 1987, 〈光復後台灣地區人類學研究的發展〉。頁 391-457, 收入賴澤涵編, 《三十年來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回顧與展望》。台北: 東大。
- 黃曬莉, 2002, 〈孰可忍? 孰不可忍? ——現代化「批判」與本土化「堅忍」之間〉。頁 111-135, 收入葉啓政編, 《從現代到本土: 慶賀楊國樞教授七秩華誕論文集》。台北: 遠流。
- 葛拉翰·史威夫特 (Graham Swift) 著、于而彥譯, 1993, 《水之鄉》(Waterland)。台北: 不二。
- 陳其南, 1985, 〈四十年來台灣人類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人類學研究與社會科學中國化〉。《中國論壇》21(1): 72-79。
- 陳紹馨, 1966, 〈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台灣〉。《民族學研究所集刊》22: 9-14。
- 楊宜音, 2002, 〈社會變遷與人的變遷——楊國樞有關中國人「個人現代性」研究述評〉。頁 19-40, 收入葉啓政編, 《從現代到本土: 慶賀楊國樞教授七秩華誕論文集》。台北: 遠流。
- 楊國樞, 1985, 〈學院生活的探索〉。頁 65-101, 收入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主編, 《我的探索》。台北: 中國論壇雜誌。
- , 1987, 〈緒論: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研究的台灣經驗〉。頁 3-31, 收入賴澤涵編, 《三十年來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回顧與展望》。台北: 東大。
- 楊懋春, 1989[?], 〈我參加台大社會學系的創立兼論首任三位教授〉。頁 55-62, 收入楊懋春著, 《新勉齋文集(下輯)》。台北: 茂昌。
- 葉啓政, 1984[1982], 〈從中國社會學既有的性格論社會學研究「中國化」的方向與問題〉。頁 273-306, 收入葉啓政, 《社會、文化和知識分子》。台北: 東大。
- , 1984[1983]a, 〈一位寂寞的社會學家: 我所接觸的龍冠海教授〉。《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16: 5-8。
- , 1984[1983]b, 〈邊陲性與學術發展——再論社會學中國化〉。頁 307-343, 收入葉啓政, 《社會、文化和知識分子》。台北: 東大。
- , 1991[1988], 〈對四十年來台灣地區社會學發展的一些反省〉。頁 197-231,

- 收入葉啓政，《台灣社會的人文迷思》。台北：東大。
- ，2002，〈遊走在學者與知識分子之間：我所認識的楊國樞老師〉。頁 305-342，收入葉啓政編，《從現代到本土：慶賀楊國樞教授七秩華誕論文集》。台北：遠流。
- ，2005，〈對現代化現象的綜合評析〉。頁 141-180，收入葉啓政著，《現代人的天命：科技、消費與文化的搓揉摩盪》。台北：群學。
- ，2005[2003]，〈台灣社會學的知識—權力遊戲〉。頁 177-213，收入葉啓政，《觀念巴貝塔：當代社會學的迷思》。台北：群學。
- 傅大為，1988，〈科學實證論述歷史的辯證：從近代西方啓蒙到台灣的殷海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4): 11-56。
- ，1990[1988]，〈從「避秦」到「反依賴」——三十年台灣「人文社會科學」歷史片段之反省〉。頁 81-93，收入傅大為，《知識與權力的空間——對文化、學術、教育的基進反省》。台北：桂冠。
- ，1992，〈歷史建構、邊陲策略與「中國化」——對台灣「行爲及社會科學中國化」提法的一思想史研究〉。頁 115-156，收入傅大為，《異時空裡的知識追逐：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論文集》。台北：東大。
- ，1993[1990]，〈曖昧的「本土」與精英的科學——從兩種「科學本土化」的意義談「科學文化」與社會的關係〉。頁 305-317，收入傅大為，《知識、權力與女人——台灣的邊緣戰鬥》。台北：自立晚報。
- ，1993[1991]，〈從「邊緣戰鬥」觀點看台灣與中國「知識分子」概念的歷史軌跡——一個初步的討論〉。頁 97-104，收入傅大為，《知識、權力與女人——台灣的邊緣戰鬥》。台北：自立晚報。
- 張承漢、林義男，1982，〈龍冠海、郝繼隆教授事略及著作目錄〉。《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15: 224-230。
- 張茂桂、章英華、湯志傑，2005，〈台灣社會學的歷史形成與制度發展〉。《現代社會理論研究》15: 448-465。
- 湯志傑，2008，〈本土社會學傳統的建構與重構：理念、傳承與實踐〉。頁 553-630，收入謝國雄主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群學。
- 趙彥寧，2001[1999]，〈國族想像的權力邏輯：試論五〇年代流亡主體、公領域、與現代性之間的可能關係〉。頁 149-198，收入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性／別、權力、國家》。台北：巨流。
- ，2001，〈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試論中國流亡、女性主體、與記憶間的建構關

- 係》。頁 199-245，收入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性／別、權力、國家》。台北：巨流。
- 鄭作彥，2010，〈時間結構的改變與當代時間政治的問題：一個時間社會學的分析〉。《台灣社會學刊》44: 213-275。
- 瞿海源，2002，〈溫和地堅持改革的楊國樞先生〉。頁 273-304，收入葉啓政編，《從現代到本土：慶賀楊國樞教授七秩華誕論文集》。台北：遠流。
- 魏鏞，1980，《科學、人才與現代化》。台北：學生書局。
- 賴澤涵編，1987，《三十年來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回顧與展望》。台北：東大。
- 蕭阿勤，2010，《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第二版）。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2015，〈敘事分析〉。頁 137-172，收入瞿海源、畢恆達、劉長萱、楊國樞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法》。台北：東華。
- 蕭新煌，1984[1983]，〈在海灘撿貝殼的老人——念龍師〉。《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16: 1-4。
- ，1983，〈追求社會學的想像（上）〉。《中國論壇》16(1): 53-57。
- ，1986，〈社會學在台灣——從「傳統」的失落到「中國化」的展望〉。頁 271-310，收入蔡勇美、蕭新煌編，《社會學中國化》。台北：巨流。
- ，1987，〈三十年來台灣的社會學：歷史與結構的探討〉。頁 329-390，收入賴澤涵編，《三十年來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回顧與展望》。台北：東大。
- 蕭新煌、李哲夫，1986，〈透視卅年來海峽兩岸社會學的發展〉。頁 311-328，收入蔡勇美、蕭新煌編，《社會學中國化》。台北：巨流。
- 謝國雄，1997，《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2003，《茶鄉社會誌：工資、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戴天昭著、李明峻譯，1996[1971]，《台灣國際政治史》。台北：前衛。
- 龍冠海，1954[1952]，〈自序〉。頁 1-2，收入龍冠海，《社會學講話》。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 ，1955，《中國人口》。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 ，1955[1954]，〈自序〉。頁 1-2，收入龍冠海，《中國人口》。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 ，1963[1951]a，〈社會調查與統計對我國社會建設之需要〉。頁 91-96，收入龍冠海，《社會調查概述》。台北：文星。
- ，1963[1951]b，〈美國的人口清查〉。頁 103-110，收入龍冠海著，《社會調查

- 概述》。台北：文星。
- ，1963[1953]，〈戶口普查的意義、功用與重要性〉。頁 97-102，收入龍冠海，  
《社會調查概述》。台北：文星。
- ，1963a，〈留美回憶的一章〉。《傳記文學》2(2): 31-14。
- ，1963b，〈社會學在中國的地位與職務〉。《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1: 1-22。
- ，1964[?]，〈孔德逝世百年來社會學的發展〉。頁 35-63，收入龍冠海編著，  
《社會學與社會問題論叢》。台北：正中。
- ，1964[1943]，〈社會與社會建設〉。頁 97-105，收入龍冠海編著，《社會學與  
社會問題論叢》。台北：正中。
- ，1964[1953]a，〈中國社會學之回顧與前瞻〉。頁 79-96，收入龍冠海編著，  
《社會學與社會問題論叢》。台北：正中。
- ，1964[1953]b，〈我國的人口〉。頁 79-109，收入龍冠海，《社會與人》。台  
北：文星。
- ，1964[1957]，〈社會思想之性質、範圍與發展途徑〉。頁 19-36，收入龍冠海，  
《社會與人》。台北：文星。
- ，1964[1963]，〈自序〉。頁 1-2，收入龍冠海編著，《社會學與社會問題論  
叢》。台北：正中。
- ，1964，〈黃膺白先生的一封信〉。《傳記文學》4(2): 37。
- ，1970，〈已經十年了!!〉。《社會導進》2(2): 1-3。
- ，1970[?]，〈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偉大人格與社會思想〉。頁 150-188，收入龍冠  
海，《社會調查與社會工作》。台北：三民。
- ，1970[1959]，〈社會統計的範圍與功用〉。頁 15-19，收入龍冠海，《社會調  
查與社會工作》。台北：三民。
- ，1970[1965]，〈社區發展與社會調查〉。頁 47-58，收入龍冠海，《社會調查  
與社會工作》。台北：三民。
- ，1971，〈發刊詞〉。《中國社會學刊》1: 1。
- ，1974[1972]，〈我為什麼愛上社會學〉。頁 56-60，收入龍冠海，《社會學與  
社會意識》。台北：自印。
- ，1975，〈自序〉。頁 1-3，收入龍冠海，《社會學與社會意識》。台北：自  
印。
- 龍冠海、張曉春，1967，〈中國家庭組織的一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  
3: 117-136。
- 顧忠華、張維安，1991，〈在台灣的中國社會學社〉。《中國社會學刊》15: 140-

169。

- Abbott, Andrew. 2001. *Time Matters: On Theory and Meth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berbach, David. 1997. "Revolutionary Hebrew, Empire, and Crisis: Towards a Sociological Gestalt."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8(1): 128-148.
- Adam, Barbara. 1990. *Time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Press.
- . 1995. *Timewatch: The Social Analysis of Time*.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Press.
- . 2004. *Time*.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Press.
- Agersnap, Torben. 2000. "Theodor Geiger: Pioneer of Sociology in Denmark." *Acta Sociologica* 43(4): 325-330.
- Alexander, Jeffrey C. 1987. *Twenty Lectures: Sociological Theor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 2003. *The Meanings of Social Life: A Cultural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llatson, Paul, and Jo McCormack. 2008. "Introduction." Pp. 9-32 in *Exile Culture, Misplaced Identities*, edited by Paul Allatson and Jo McCormack. Amsterdam, Netherlands: Rodopi.
- Bergmann, Werner. 1992. "The Problem of Time in Sociology: An Over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State of Theory and Research on the 'Sociology of Time', 1900-1982." *Time and Society* 1(1): 81-134.
- Bourdieu, Pierre. 1990[1982]. "A Lecture on the Lecture." Pp. 177-198 in *In Other Words: 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translated by Matthew Adams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ierre, Jean-Claude Chamboredon,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1991[1968]. *The Craft of Sociology: Epistemological Preliminaries*,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 Breiner, Peter. 2004. "Translating Max Weber: Exile Attempts to Forge a New Political Sci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3(2): 133-149.
- Bruner, Edward M. 1986. "Ethnography as Narrative." Pp. 139-155 in *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 edited by Victor W. Turner and Edward M. Brun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Bruner, Jerome. 1986. *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1990. *Acts of Mean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2002. *Making Stories: Law, Literature, Lif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yson, Valerie. 2007.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Time: Feminist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Bristol, England: The Polity Press.
- Calhoun, Craig. 1998.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Narrative, General Theory, and Historical Specific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3): 846-871.
- Carr, David. 1986. *Time, Narrative, and History*.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Chang, Maukuei. 2005. "The Movement to Indigenize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aiwan: Origin and Predicaments." Pp. 221-260 in *Cultural, Ethnic, and Politic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Taiwan: Bentuhua*, edited by John Makeham and A-chin Hsiau.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Chase, Susan E. 1995. *Ambiguous Empowerment: The Work Narratives of Women School Superintendents*.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 2005. "Narrative Inquiry: Multiple Lenses, Approaches, Voices." Pp. 651-679 in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 edited by Norman K. Denzin and Yvonna S. Lincol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Chase, Susan E., and Mary F. Rogers. 2001. *Mothers and Children: Feminist Analyses and Personal Narrative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Cicchelli, Vincenzo, Catherine Pugeault-Cicchelli, and Maurezio Merico. 2006. "Individual and Social Temporalities in American Sociology (1940-2000)." *Time and Society* 15(1): 141-158.
- Coser, Lewis A. 1984. *Refugee Scholars in America: Their Impact and Their Experienc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oser, Lewis A., and Rose L. Coser. 1963. "Time Perspective and Social Structure." Pp. 167-179 in *Modern 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uman Interaction*, edited by Alvin W. Gouldner and Helen P. Gouldn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 Dienstag, Joshua Foa. 1997. *Dancing in Chains: Narrative and Memory in Political Theo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rkheim, Emile. 1915[1912].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translated by Joseph Ward Swain. New York: Free Press.
- Edmunds, June, and Bryan S. Turner. 2002. *Generations, Culture and Society*. Buckingham, Engl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 Elchardus, Mark. 1988. "The Rediscovery of Chronos: The New Role of Time in Sociological Theory."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3(1): 35-59.
- Elias, Norbert. 1992[1987]. *Time: An Essay*. Translated in part from the German by Edmund Jephcott. Oxford, England: Blackwell.
- Ewick, Patricia, and Susan S. Silbey. 1995. "Subversive Stories and Hegemonic Tales: Toward a Sociology of Narrative." *Law and Society Review* 29(2): 197-226.
- . 1998. *The Common Place of Law: Stories from Everyday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2003. "Narrating Social Structure: Stories of Resistance to Legal Author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8(6): 1328-1372.
- Flaherty, Michael G. 1999. *A Watched Pot: How We Experience Tim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 2005. "An Accelerating Tempo: Recent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Time." *Symbolic Interaction* 28(2): 291-296.
- Gellner, Ernest. 1964. *Thought and Chan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74. "Introduction." Pp. 1-22 in *Positivism and Sociology*, edited by Anthony Giddens. London: Heinemann.
- .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1981.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 Gotham, Kevin Fox, and William G. Staples. 1996. "Narrative Analysis and the New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7(3): 481-501.
- Griffin, Larry J. 1992. "Temporality, Events,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0: 403-427.
- . 1995. "How Is Sociology Informed by History?" *Social Forces* 73(4): 1245-1254.
- Gurvitch, Georges. 1964. *The Spectrum of Social Time*. Dordrecht: D. Reidel.
- Hall, John R. 1979. "Time and Communal Life, an Applied Phenomenology." *Human Studies* 2: 247-258.
- Harris, Jonathan. 1995. *Greek Emigres in the West, 1400-1520*. Camberley, England: Porphyrogenitus.
- Hassard, John. 1990. "Introductio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Time." Pp. 1-18 in *The Sociology of Time*, edited by John Hassard. Hampshire, England: Macmillan.

- Hinrichs, Karl, William Roche, and Carmen Sirianni, eds. 1991. *Working Time in Transi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rking Hours in Industrial Nations*.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Hitlin, Steven, and Glen H. Elder, Jr. 2007. "Time, Self, and the Curiously Abstract Concept of Agency." *Sociological Theory* 25(2): 170-191.
- Hollis, Martin. 1994.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lstein, James A., and Jaber F. Gubrium. 2000. *The Self We Live By: Narrative Identity in a Postmodern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siao, A-chin (蕭阿勤). 2010. "A 'Generation in-Itself': The Authoritarian Rule, Exilic Mentality, and the Postwar Generation of Intellectuals in 1960s Taiwan." *The Sixties: A Journal of History, Politics and Culture* 3(1):1-31.
- Jacobs, Ronald N. 1996. "Civil Society and Crisis: Culture, Discourse, and the Rodney King Beating."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5): 1238-1272.
- Jacobs, Ronald N., and Sarah Sobieraj. 2007. "Narrative and Legitimacy: U.S. Congressional Debates about the Nonprofit Sector." *Sociological Theory* 25(1): 1-25.
- Jensen, Gary F. 1997. "Time and Social History: Problems of Atemporality in Historical Analyses with Illustrations from Research on Early Modern Witch Hunts." *Historical Methods: A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and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30(1): 46-57.
- Kettler, David. 2006. "A German Subject to Recall: Hans Mayer as Internationalist, Cosmopolitan, Outsider and/or Exile." *New German Critique* 96:171-181.
- Krohn, Claus-Dieter. 1993[1987]. *Intellectuals in Exile: Refugee Scholars and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translated by Rita and Robert Kimber.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Lam, Tong. 2011. *A Passion for Facts: Social Survey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tate, 1900-19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amberti, Marjorie. 2006. "The Reception of Refugee Scholars from Nazi Germany in America: Philanthropy and Social Change in Higher Education." *Jewish Social Studies: History, Culture, Society*, 12(3): 157-192.
- Landau, Misia. 1991. *Narratives of Human Evolu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ewis, J. David, and Andrew J. Weigert. 1981. "The Structures and Meaning of Social Time." *Social Forces* 60(2): 432-462.

- Loseke, Donileen R. 2007. "The Study of Identity as Cultural, 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al, and Personal Narrative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tegrations."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8: 661-688.
- Lung, Kwan-hai. 1971. "Post-War Social Change in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1945-1969." *ASPAC Quarterly of Cultural and Social Affairs* 2(4): 7-45.
- Lyman, Stanford M. 1994. "A Haven for Homeless Intellectuals: The New School and Its Exile Facul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7(3): 493-512.
- MacIntyre, Alasdair. 1984.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Mahoney, James. 2000.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29 (4): 507-548.
- Maines, David R. 1993. "Narrative's Moment and Sociology's Phenomena: Toward a Narrative Sociology."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 (1): 17-38.
- . 2001. *The Faultline of Consciousness: A View of Interactionism in Sociology*.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Martins, Herminio. 1974. "Time and Theory in Sociology." Pp. 246-294 in *Approaches to 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Major Trends in British Sociology*, edited by John Rex.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McCarthy, Mary. 1994[1972]. "A Guide to Exiles, Expatriates, and Internal Emigrés." Pp. 49-58 in *Altogether Elsewhere: Writers on Exile*, edited by Marc Robinson. San Diego, CA: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 Mei, Wen-li. 1963. "The Intellectuals on Formosa." *The China Quarterly*, (15): 65-74.
- Moen, Phyllis, ed. 2003. *It's about Time: Couples and Career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oore, Wilbert E. 1963. *Man, Time, and Society*. New York: Wiley.
- Mukerjee, Radhakamal. 1943. "Time, Technics, and Society."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27: 255-266.
- Nash, Christopher, ed. 1990. *Narrative in Culture: The Uses of Storytelling in the Sciences,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London: Routledge.
- Negrey, Cynthia. 1993. *Gender, Time, and Reduced Work*.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Nisbet, Robert A. 1969. *Social Change and History: Aspects of the Western Theory of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rbuch, Terri L. 1997. "People's Accounts Count: The Sociology of Accou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3: 455-478.
- Pavel, Thomas. 1996. "Exile as Romance and as Tragedy." *Poetics Today* 17(3): 305-315.
- Plummer, Ken. 1995. *Telling Sexual Stories: Power, Chang and Social Worlds*. New York: Routledge.
- Polkinghorne, Donald E. 1988. *Narrative Knowing and the Human Science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 2005. "Narrative Psycholog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Relationships and Perspectives." Pp. 3-22 in *Narration,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edited by Jürgen Straub.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 Polletta, Francesca. 1998a. "Contending Stories: Narrative in Social Movements." *Qualitative Sociology* 21(4): 419-446.
- . 1998b. "'It Was Like a Fever ...' Narrative and Identity in Social Protest." *Social Problems* 45(2): 137-159.
- Polletta, Francesca, and John Lee. 2006. "Is Telling Stories Good for Democracy? Rhetoric in Public Deliberation after 9/1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1(5): 699-723.
- Ricoeur, Paul. 1984[1983]. *Time and Narrative*, vol. 1. Translated by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85[1984]. *Time and Narrative*. vol.2. Translated by 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88[1985]. *Time and Narrative*. vol. 3. Translated by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iessman, Catherine Kohler. 1990. *Divorce Talk: Women and Men Make Sense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 1993. *Narrative Analysis*. Newbury Park, CA: Sage.
- . 2008. *Narrative Methods for the Human Scienc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Rolleberg, Denise. 2007. "The Brazilian Exile Experience: Remaking Identities."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34(4): 81-105.
- Roy, Donald F. 1960. "Banana Time: Job Satisfaction and Informal Interaction." *Human Organization* 18: 156-68.
- Said, Edward W. 2000[1984]. "Reflections on Exile." Pp. 173-186 in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edited by Edward W. Sai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egre, Sandro. 2000. "A Weberian Theory of Time." *Time and Society* 9(2/3): 147-170.

- Sewell, William H. Jr. 1996. "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 Pp. 245-280 in *The Historical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edited by Terrence J. McDonald.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Shahidian, Hammed. 2000. "Sociology and Exile: Banishment and Tensional Loyalties." *Current Sociology* 48(2): 71-99.
- Shils, Edward. 1980. *The Calling of Sociology and Other Essays on the Pursuit of Learn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imms, Karl. 2003. *Paul Ricoeur*. London: Routledge.
- Smith, Tammy. 2007. "Narrative Boundaries and the Dynamics of Ethnic Conflict and Conciliation." *Poetics* 35: 22-46.
- Somers, Margaret R. 1992. "Narrativity, Narrative Identity, and Social Action: Rethinking English Working-Class Formatio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6(4): 591-630.
- . 1996. "Where Is Sociology after the Historical Turn? Knowledge Cultures, Narrativity, and Historical Epistemologies." Pp. 53-89 in *The Historical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edited by Terrence J. McDonald.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Somers, Margaret R., and Gloria D. Gibson. 1994. "Reclaiming the Epistemological 'Other': Narrativ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Pp. 37-99 in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Oxford, England: Blackwell.
- Sorokin, Pitirim A., and Robert K. Merton. 1937. "Social Time: A Method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2(5): 615-629.
- Steinmetz, George. 2010. "Ideas in Exile: Refugees from Nazi Germany and the Failure to Transplant Historical Sociology into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23(1): 1-27.
- Stroińska, Magda, and Vittorina Cecchetto. 2003. "Exile, Language and Identity: An Introduction." Pp. 13-15 in *Exile, Language and Identity*, edited by Magda Stroińska and Vittorina Cecchetto.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 Šubrt, Jirí. 2001. "The Problem of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Czech Sociological Review* 9(2): 211-224.
- Swift, Graham. 2010[1983]. *Waterland*. London: Picador.
- Sztompka, Piotr. 1993. *Sociology of Social Change*. Oxford, England: Blackwell.
- Tabori, Paul. 1972. *The Anatomy of Exile: A Semantic and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George Harrap.

- TenHouten, Warren D. 2005. *Time and Societ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Thiele, Leslie Paul. 2006. *The Heart of Judgment: Practical Wisdom, Neuroscience, and Narrative*.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1984. *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 New York: Russell Sage.
- . 1988. “Future History.” *Theory and Society* 17(5): 703-712.
- Townsley, Eleanor. 2001. “‘The Sixties’ Trop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8(6): 99-123.
- Wacquant, Loïc J. D. 1992. “Toward a Social Praxeology: The Structure and Logic of Bourdieu’s Sociology.” Pp. 1-59 in Pierre Bourdieu and Loïc J. 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oodhull, Winifred. 1993. “Exile.” *Yale French Studies* 82: 7-24.
- Yamane, David. 2000. “Narrative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 *Sociology of Religion* 61(2): 171-189.
- Zerubavel, Eviatar. 1979. *Patterns of Time in Hospital Life: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81. *Hidden Rhythms: Schedules and Calendars in Social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85. *The Seven-Day Circle: 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Week*. New York: Free Press.
- . 1997. *Social Mindscales: An Invitation to Cognitive Soci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2003. *Time Maps: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Social Shape of the Pa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